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喻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朱杰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吴元庆 张吉林

张刚强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0年 第4期 总第126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 任 编 辑:宋 好 鲍跃华 龚万达

本刊特稿

- 人民政协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定型 / 张献生 04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基础与实践应用 / 刘晓玲 许 烨 12

精英民主与和和博弈: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面相及其当代启示

- 以“五一口号”为切入点 / 彭剑鸣 20

政党制度

- 从“特色”到“新型”: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综述 / 吴智楠 29

- 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机制性安排刍议 / 朱毅民 朱 洁 许昆峰 38

-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 / 卢婉春 44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电子邮箱:jssyxh@163.com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民营经济

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课题组

5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突破方略研究 / 蔡云清 李碧珍

65

学习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谢 军

7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景观中的体现 / 张羽清 范佳鸣

76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3 * 2020 - 08

人民政协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定型

张献生

摘要:人民政协制度作为伟大的政治创造,在 70 多年实践中奠定了坚持、完善、定型的坚实基础。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性质的构成和定位,人民政协制度的属性和特点,在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中履行职能、凝聚共识,建立健全发挥人民政协制度效能的支持保障的制度机制,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完善和定型的着力重点和关键所在。

关键词:人民政协制度;性质;政治形式;组织形式;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04-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的事业发展全局和长远出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定型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制定了行动纲领。人民政协制度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完善和定型,是坚持人民政协制度、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人民政协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

人民政协作为制度安排,不是旧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自然延续,也不是对外国政治制度的模仿照搬,而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的,“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

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人民共商国是的开端。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机关,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虽然两千多年前中国就产生了民为邦本、民为贵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政治理念,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共商国是从未成为现实,更没有成为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效仿美国建立的政体,由于不符合国情,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很快

收稿日期:2020-07-06

作者简介:张献生,中央统战部原秘书长。

就夭折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推进民主建立了国民参政会,但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国民参政和政治协商。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召开了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的目的只是为打内战争取时间,使政治协商取得的重要成果成为一纸空文,只留下政治协商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政协,是各革命阶级、各政党、各民族、各方面人民的广泛协商,开创了中国人民共商国是的新局面和人民民主的新形式,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开端。

人民政协制度是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创新。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政治体制——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机关都由苏维埃产生,并对它负责和报告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创造。新中国成立前后确立国家政治体制时,在确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过程中,创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机关长期存在,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发挥独特作用。由此形成了由国家领导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治协商机关构成的新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人民政协是对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超越。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统治。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主要是代议制,以议会为政权组织,以选举为实现形式,以权力分设与制衡为主要特征,虽然

相比封建专制是一个进步,其实质仍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统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人民共商国是的专门协商机构,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它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互相契合,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更加真实、广泛、有效地体现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它既优于单纯依靠投票的西方选举民主,也超越了西方尚在理论探讨中的协商民主,有利于人民的持续政治参与,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有利于人民群众实际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人民政协制度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适应中国基本国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凝结着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行得通、很管用的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能够紧密团结各政党、各民族、各群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具有独特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必须在新时代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二、人民政协制度完善和定型的坚实基础

人民政协已经走过了70年光辉历程,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中,展示了鲜明特色和多方面的独特优势。特别是7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确立了重要原则,也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级、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2]人民政协70年巩固发展、发挥职能作用、取得辉煌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新时代人民政协要坚持正确方向、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开拓创新、推进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人民政协经过 70 年的实践发展，其性质定位已经形成了 2018 年政协章程全面完整的“五句话”表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人民政协的鲜明特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是人民政协政治地位、基本功能、重要价值的集中体现。新时代，坚持人民政协制度，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必须恪守这个性质定位。

坚持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基础；发展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方向和使命。”^[3]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只有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才能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

坚持履行政协的基本职能。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中就蕴含着政治协商，人民政协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履行政治协商职能。1956 年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民主监督就成为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政协职能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的不断拓展，参政议政成为新的重要职能。政协三大职能，实质是体现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价值是促进民主科学决策，要旨是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在新时代发挥人民政

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最基本的就是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坚持以政协委员为主体。人民政协实行委员制，委员以自己的学识、能力和影响，作为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参加人民政协，从而成为政协的基本构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2018 年政协章程首次增加“委员”一章，对委员履职尽责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在新时代坚持人民政协制度，必须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

坚持政协工作的重要原则。《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在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明确了坚持人民政协制度的主要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依照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把握性质定位，完善政协职能，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心聚力；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些原则是人民政协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人民政协制度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新时代坚持人民政协制度、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遵循。

三、人民政协性质的构成和定位

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定型，首要的是准确把握政协的性质定位。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是贯穿人民政协发展始终、决定方向使命、发挥职能作用的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4]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已经形成“五句话”表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的产物，也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新时代的多重属性和功能。人民政协制度在政协性质上的完善和定型，主要是正确认识和界定“五句话”表述及其内在关系。“五句话”表述中的每一句话都揭示了政协性质的一个方面，每一句话都有特定的内涵。但是，这“五句话”在人民政协性质结构和相互关系中并不是平列的、等同的，而是“1+4”的基本结构，是基本性质和重要性质的统一。统一战线组织是人民政协首要的基本性质。人民政协是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产生的，构成人民政协的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和各界人士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人民政协工作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履行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根本职能。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是由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决定的。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功用作用，参与国家治理，也是建立在统一战线政治组织和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可以说，统一战线是人民政协制度的逻辑起点，是人民政协的母体，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组织这个基本属性相联系的重要性质构成，是统一战线组织基本性质向“四个维度”的延伸和深化^[5]。因此，对政协性质的完善和定型，必须深刻认识人民政协性质“五句话”中“1+4”的结构关系，牢牢把握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基本性质。

把握和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的非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围绕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问题，出现过不同声音。有的是要把人民政协作为西方国家的上院或参议院，实行两院制，赋予政协国家权力，可以对政府进行质询和弹劾。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民政协的性质，背离了我国宪法和政协章程。此外，在讨论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中，有的同志提出

政协应定位为国家协商机关，属于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这又涉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也涉及对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基本性质的把握。什么叫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是指“一个国家的各个具体的国家权力部门”，是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7]。我国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军事机关等。即使是作为国家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本身也不是国家机关。人民政协性质的核心要义是非国家权力机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机关。因此，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人民政协作为国家协商机关，必然改变其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改变其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机关的本质。这也是对人民政协性质完善和定型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人民政协制度的属性、特点和定型

人民政协建立 70 年来，人民政协制度始终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来定位和表述，而是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个表述写入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国家宪法，是新型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依据。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人民政协制度，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8]《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也强调，“以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如何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制度的性质、内涵、特点与定位，即它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是作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列的独立政治制度，还是继续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结合的制度，就成为人民政协制度完善与定型的一

个重要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研究人民政协制度建立 70 年来，为什么始终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制度来表述。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同，人民政协成立以来，无论是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还是政协章程，始终没有把人民政协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单独界定和表述。2006 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也是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强调的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人民政协则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文件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2019 年，《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强调，“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来界定，而是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中，明确提出了“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人民政协章程对人民政协性质的“五句话”表述中，也没有将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达。2019 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仍然没有把人民政协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列，而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中加以规范和强调，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9]

为什么是这样？这是由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人民政协不是一个单独的完全的政治实体，而是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

式。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组成人民政协的各个界别，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成员；人民政协履行的各项职能，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职能在政协这个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体现和延伸；人民政协的功能作用，实质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和实现。因此，无论是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还是政协章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始终是人民政协性质的基本定位，也成为人民政协制度的本质属性。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2019 年，《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也强调，“以强化统一战线组织功能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要求，“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10]因此，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已经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单独列出的情况下，再把作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人民政协制度作为独立制度与之并列，显然是不科学不合适的，不仅不符合人民政协制度的性质特点，而且会造成重复交叉，在内容与形式上导致逻辑混乱。

在对人民政协制度性质和定位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定型，是作为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提出来的，是一种更高的政治站位，要解决的是人民政协在历史进程中处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趋势问题，要把人民政协制度作为国家实体性的制度，而不能作为人民政协的具体履职制度以及支撑履职的程序性工作制度^[11]。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需要明确的是，研究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把握人民政协制度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的政治制度的性质

和特点，它始终建立在人民政协只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基础上。人民政协制度无论是实体性还是程序性，都是为发挥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功能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提供支持、支撑和保障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协章程明确的人民政协“五句话”的性质规范，实际上已经确定了人民政协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也明确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作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和组织形式，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全方位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人民政协制度概念，并不是以新的内涵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重新定位，而主要是一种集中性概括性表述，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的人民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人民政协制度的基本内涵，仍然是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组织形式、中国人民专门协商机构履行职能作用、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各种制度规范、行为准则和运行机制的总和。虽然在新时代随着历史方位、形势任务的变化，人民政协制度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只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不变，其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定位就不会改变。这也决定了人民政协制度完善和定型的着力点，就是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着眼人民政协职能作用的发挥和政协事业的发展，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以宪法和相关政策为依据，建立健全以政协章程为基础，以协商制度为主干，覆盖政协党的建设、履职责工作、组织管理、内部运行等各方面的制度，形成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关系顺畅、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五、在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中履行职能、凝聚共识

人民政协成立后，逐步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要求人民政协“以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凝心聚力。”并明确“在坚持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的同时，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的重要职能”。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是履行职能的中心环节，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的一个着力重点。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着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新内涵，集中体现着人民政协的特色和优势，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坚实基础和广阔平台。完善人民政协职能，首先要明确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显著特点和职能责任，更好地发挥政协组织及其协商的平台、机制、程序等作用。要深刻把握专门协商机构的政治性、合作性、专业性要求，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的联系与区别，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独特优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协商能力建设，着力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通过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不断提高人民政协的履职水平，把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色优势充分展现出来。

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的重要职能，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要旨。人民政协的协商是政治协商，是各族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而不是互为对手的谈判，也不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讨价还价。它以团结和民主为主题，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和协调关系的有效方式。因此，凝聚共识就成为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履行协商、议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求，就

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中心环节，以及检验专门协商机构政治协商效能的重要标准。在政治协商中，只有不断凝聚共识，才能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增强自信，奠定和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才能统一认识和步调，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厚植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智慧和力量，广泛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因此，人民政协职能的完善和定型，最重要的就是着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以凝聚共识作为履职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使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12]

六、建立健全发挥人民政协制度效能的支持保障机制

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定型，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新时代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的效能，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治理中有新的更大的作为。这就需要具有科学的支持保障机制，以健全的制度、合理的程序、有效的机制保证制度功能作用的实现。特别是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机关；不是行使国家权力，而是体现和发扬民主权利；协商议政不具有决定性，而是咨政建言，是一种政治影响力；协商、议政、监督的对象，是国家领导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监察机关等。只有建立健全相应的支持和保障机制，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协商优势、话语优势，才能对国家法律的制定、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具有影响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制度机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政协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人民政协坚持正确方向、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也是坚持人民政协制度、推

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完善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的督查机制，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在政协全部工作中得到落实。政协党组要全面肩负起实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重大政治责任，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要切实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把各级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政协组织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健全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履职尽责的制度机制。人民政协中，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做出机制性安排，是多党合作机构的职责所在。要切实保障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开展批评的权利，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要搞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协调和衔接，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民政协经常性活动和共同性事务的工作机制，为民主党派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条件。

健全完善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制度机制。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发挥政协特色优势的集中体现。要坚持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保证明确规定需要政协协商的事项能够经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要对协商的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做出规范，营造平等、宽松、团结、和谐的民主环境，健全协商成果反馈和落实机制，建立协商议政质量评价体系，促进各种意见建议的合理成分得到充分吸纳，不断提高协商的质量与成效。

建立健全完善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制度机制。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实现党的领导、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要旨。一方面，要优化界别设置，充分体现人民

政协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包容性,丰富协商的内容和形式,搞好委员专题调研视察的组织保障,建立富有政协特色的应用型智库,使建言资政的主体更加全面、空间不断拓宽、保障更加切实、平台更加广阔,使各个方面不同意见建议都能够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到履责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制度、程序和机制,建立寓思想政治引领于团结民主之中的工作制度,建立以凝聚海内外共识为目标的委员讲堂和专题性委员宣讲制度,在健全协商议政规则的基础上就加强和改进凝聚共识工作形成制度规范,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建立健全人民政协共同性事务情况交流处理制度机制。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担负着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的重要职责。这就要求人民政协要全面了解统一战线不同方面成员的情况,及时化解矛盾和分歧,建立处理好共同性事务的工作机制。要适应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趋势,健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民族界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将他们纳入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中来,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在团结和谐中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实现。

建立完善政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制度机制。人民政协是以统一战线为依托、各界委员为主体、以协商建言监督为方式参与国家治理的组

织形式。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能力建设,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不断提高政协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完善政协系统的联系与指导。在完善自身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的基础上,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促进治理目标的深入实施和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 [1][8][10][12]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9-09-20).http://www.news.cn/2014/images/xh_logo.png.
- [2][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7-68.
- [3] 江泽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3.
- [5] 浦兴祖.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坚守与深化[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 (5):63.
- [6]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0.
- [7]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6.
- [9]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
- [11] 张峰.论人民政协的国家制度性质[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 (5):71.

责任编辑:宋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基础与实践应用

刘晓玲 许 烨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包含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时代定位、工作目标、范围界定、重点对象、基本原则等方面,是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这些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大统战”格局,具体要做好摸底掌握党外知识分子全貌,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工作,探索建立精细化分类施策制度,优化党外知识分子成长路径等工作。

关键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12-08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并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就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是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一)时代定位: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外知

分子工作的定位从“基础性工作”提升至“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基础性”是因为党外知识分子至今依然是党外各界代表人士的“源头”,所以最大变化也就在于“战略性”。战略性通常是指对全局目标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事物。这说明,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此相应,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重点将更加侧重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二)工作目标: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刘晓玲,湘潭市社会主义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许烨,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法学博士,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课题“习近平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XTKT2019031)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虽然这些讲话是面向全体知识分子的，但由于党外知识分子约占四分之三，因而这些讲话对于党外知识分子同样适用。

1.要把党外知识分子凝聚起来

“聚”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首要问题。如何“聚”？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3]宽松的环境氛围更能让党外知识分子找到价值感和归属感，更能让他们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其次要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只有让党外知识分子真正认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让他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2.要把党外知识分子用起来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在于“用”。如何“用”？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配备党外干部作为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让党外知识分子在适合的层级、岗位进行历练，是习近平总书记向来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其次要求遵循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找出规律，量体裁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4]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同时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本身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方面的要求也较高。尊重并遵循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和规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针和政策是将他们“用”起来的基本遵循。

（三）范围界定：四支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主要涵盖四支队伍，即：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两新”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工作以及新媒体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这四支队伍中，第一支队伍是传统的体制内党外知识分子，后三支队伍扩展到体制外和海外。虽然有所交叉，但又各具特点，因此在目标要求、工作重点和方式方法上各有侧重。

1.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外知识分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和会后下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从重点对象、主要内容、责任主体等方面论述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点对象是四类人员；主要内容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责任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组(党委)^[5]。

2.“两新”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队伍“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流动性很大，思想比较活跃，做他们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管用。”^[6]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做好这部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思路——组织起来。通过他们所在的“两新”组织将他们组织起来。如何组织？在顶层设计上，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具体措施上，加强对各类联谊组织、“自组织”的引导，着力创新平台载体等。

3.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工作

留学人员工作向来都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留学人员工作列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就这支队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欧美同学会努力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7]为此，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印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该《意见》对留学人员组织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要求。

4. 网络人士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网络人士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大都属于新的社会阶层。这两个群体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这两类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正式被纳入统战工作对象。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这两类群体进行了全面论述。他明确要求，要主动团结他们，做好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要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渠道；要在这个领域培养一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四) 基本原则

1. 既要充分信任又要加强引导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8]。其中，“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要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政治上充分信任”依然放在首位，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逻辑起点。“思想上主动引导”是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的大前提下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引导，以巩固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样才能把党外知识分子这个阵地守好。”^[9]

2. 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适度包容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统战工作的重大原则。这项原则具体到党外知识分子就是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适度包容。坚持底线是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体现一致性，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度包容是方式方法，体现多样性，就是尊重包容差异。“只要政治方向上没有问题，应当多尊重和包容，做到容人之异、容人之短、容人之失”“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包容和爱护。

3. 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10]如前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党外知识分子的分布特点将其分为四支队伍，并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每支队伍的不同特点及工作要领。对于“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和改进工作方法；对于“两新”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要通过他们所在的组织开展工作；对于归国留学人员要发扬留学报国传统；对于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要重视其代表性人士的队伍建设。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植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士”人阶层的有益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论述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包含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般原理和原则，其中也阐述了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如何吸收团结知识分子等方面的论述为习近平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

1. 知识分子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1]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知识分子区别于资产阶级，将他们列为雇佣劳动者，看作“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这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质的规定。

2.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了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看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

川的通航，……—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要取得完全和彻底的胜利，必须要成为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人。

3. 夺权过程前后建立一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队伍

恩格斯在1891年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指出，如果“有足够能量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13]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致辞中，他更是鲜明指出，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一样，属于同一个队伍，负有同样的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都包含着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论述。这些思想和论述是习近平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来源。

1.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基本方针、原则和政策至今仍然是正确、适用的。一是必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4]二是团结、教育、改造。团结就是要争取知识分子，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教育和改造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三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15]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逐步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2.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统一全党认识，彻底实现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

集体的成果。一是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准确完整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并统一了全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二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从逻辑上肯定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三是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个尊重”是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总方针。四是提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6]，取代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3.江泽民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和发展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政策。一是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政策。二是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扩展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它不仅肯定了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同工农群体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者属性，而且肯定了创造性知识分子和人才的地位。三是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求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知识分子工作，真正交几位知心的专家朋友。

4.胡锦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胡锦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人才强国战略上升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人才强国战略的具体化。与此同时，胡锦涛对“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进行了补充和深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优势”等重要观点。

(三)中国传统文人阶层的有益成果

在中国古代，与“知识分子”相近的概念是

“士”或“士大夫”。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文化传统，它是习近平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文化营养。

1.以身载道

“士”阶层在诞生之初，就以“以身载道”为使命。所谓“道”，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是“士”心中关乎宇宙人生的最高法则。孔子的身份就是“士”，他告诫弟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范仲淹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均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对社会的责任感。

2.批判精神

“士”追求“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以“道”与权力相抗衡，对与“道”相违的人、事进行批判。因而，“士”先天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不休，百姓苦不堪言。对于这种“无道”社会，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又如，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有御史和谏官。御史监察百官、谏官纠正皇帝。这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批评朝廷的合法“言路”。

3.经世传统

“士”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因此，出仕为官是中国古代“士”的正途，即是所谓的“经世”。“经世”要求“士”必须要高度关注社会现实，体验社会生活。中国古代士人积极地“出仕”，治国平天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善于治国安邦的功臣名相。如孔子、孟子、白居易、王安石、司马光、张居正、海瑞、郑板桥等等。“经世”传统上承先秦下及明清，一直贯穿于“士”的文化血脉之中。

4.注重修身

强调修身是各家各派对“士”的普遍要求，儒家表现得最为突出。《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无论是要治理好自己的国

家，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都得从重视自身的修养做起。为什么“士”特别注重修身呢？最根本原因是为“道”。若“士”不能以身作则，何以弘道呢？因此，修身就在客观上成为“士”一辈子的必修课。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相关实践经验上，结合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呈现的新特征所提炼出来的习近平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来源于实践也应用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历史经验

1.正确处理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问题

纵观中共党史，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充实。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得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一定要牢牢记取。”^[16]

2.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列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1979年，邓小平指示：“知识分子问题，统战部应注意。……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反映全貌。”^[17]这是中共第一次明确将知识分子问题列入统一战线的范畴。邓小平这里所讲的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党外知识分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2000年，江泽民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尤其要重点做好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内容、职能、任务也随之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确。

3.给党外知识分子以相应的社会政治安排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十分关心爱护党外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给绝大多数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安排适当的工作,并对其中一部分代表人物委以重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积极倡导“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等政策,极大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立论的积极性。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继续深入推进相关部门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安排、实职安排和社会安排。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将选拔党外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相关实践

习近平到地方工作后,从河北正定到闽、浙、沪,更是积累了大量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具体实践。

1.在河北正定、福建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

习近平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党外知识分子贾大山,并举荐贾大山担任县文化局局长。调往福建工作后,习近平就党外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发表了大量的讲话。他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工作。其中特别强调,选拔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要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如果基本素质和条件具备,可以适应形势要求在选拔上破格使用;还要大胆提拔中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这些讲话精神已经清楚地表达出要加大对党外知识分子实职安排力度的思想。

2.在浙江、上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从党外知识分子中识才和储才

从2002年10月开始到2007年3月,习近平主政浙江。适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印发以及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为此,中共浙江省委部署实施了“十百千党外后备干部工程”,从顶层设计上对全省党外后备干部的数量、培养、锻炼等方面做出规划。在担任上

海市委书记以后,习近平强调,要努力造就一支在海内外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代表人士队伍。由此可见,从党外知识分子中识才和储才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

(三)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呈现的新特征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准确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的新特点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现实依据。

1.党外知识分子人数过亿且构成复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党外知识分子已达8900多万。截至2015年底,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外知识分子超过1.3亿。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15年底的4年里,党外知识分子人数增长了4000多万。毫无疑问,从2015年底到现在,其人数肯定又有所增长。不仅如此,而且党外知识分子很难用某种单一指标划分。比如,不少党外知识分子既在体制内工作,又是归国留学生。因此,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可能会出现交叉重叠等情况。

2.党外知识分子思想独立且价值多元

党外知识分子在职业选择、职业活动以及政治归属和思想言论上,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除了必须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外,其余的束缚很少。还有部分有留学经历的党外知识分子,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十分推崇,甚至完全沿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回到国内,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又对国情现状知之甚少,往往从纯学术或者带有偏见的角度出发。这致使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并不笃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事物的评判角度更为多元。

3.党外知识分子诉求各异且表达强烈

由于党外知识分子所处行业、区域和界别不同,境遇也不同,自然造成各自的利益诉求也不相同。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择业型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热情随之高涨,政治诉求强烈。与强烈的政治参与

意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参与的功效感较低。虽然党外知识分子表达诉求的途径也越来越多，但在实际中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有的党外知识分子在诉求表达受限后，情绪被激化，开始走上非制度化途径。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应用

(一)全面摸底,掌握当地党外知识分子全貌

1.要完善好党外知识分子基础数据库

统战部门要综合各单位和组织所了解的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进一步夯实基础数据库，填写信息项。随时关注党外知识分子的时点数据，及时跟进，动态维护，实现各类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导入、导出等。根据设定条件对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进行综合查询和统计分析，生成适应不同业务需要的表格和名册。

2.要建设好各类党外知识分子新媒体平台

积极占领网络阵地，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服务热线”等手段，及时了解掌握他们对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要决策的意见和诉求。利用微博、QQ、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网上调研、网上座谈、网上聚人，及时准确地了解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让工作从单向交流向多向互动转变，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交流转变。

3.要健全与党外知识分子代表联系交友制度

探索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联系交友制度。建立交友名单，特别是加强与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联系交友，与他们连得上线、对得上话、交得了心。同时，要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联席会议，通过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的形式来协调解决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突出重点,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工作

1.要以先进的思想教育人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因此，各项思想政治教育都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同

时，要积极开辟社会课堂，使思想政治引导与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2.要以远大的理想鼓舞人

思想政治工作以实现一定目标为目的，鼓舞人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是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我国知识分子，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最鲜明的品格就是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正因如此，作为共同目标，中国梦能够感召和吸引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和奋斗。

3.要以共同的事业团结人

伟大的事业最具感召力、聚合力。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宣示这项伟大的事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外知识分子要“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当然，共同的事业首先意味着共同参与。如果党外知识分子不能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发展条件，很难做到凝心聚力、同心同德、风雨同舟。

(三)把握规律,探索建立精细化分类施策制度

1.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各类主题活动之中

各类主题活动是当前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有利资源，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各类主题活动之中。要探索开展更多更富时代气息、更受欢迎、更生动活泼的主题活动。比如，举办读书分享会，通过互动交流，分享学习感悟，加强自我教育。还可以结合重大政治事件节点，开展分层分类开展国情考察活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2.分层分类创建和优化组织载体

做好“两新”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和留学人员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将他们广泛组织起来。一方面，原有的知联会、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等党外知识分子统战组织要不断做大做强，继续发挥作用。如：欧美同学会要继续吸引更多的高端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加入，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另一方面，依托社区开展党外知识分子

统战工作。必须发挥社区组织的“零距离”优势,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广泛联系、密切接触、深入了解、多方协调,使工作更加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3.拓宽互联网参政议政渠道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诉求,扩大他们参政议政的机会。对网络“意见”人士特别是网络“异见”人士,要通过“私人订制”的个性化方案,更多地邀请他们参加参观调研、议政建言等活动,使他们从“暗处”变“明处”、从“后台”到“前台”,把他们在网絡上的影响力延伸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来,增加团结面。

(四)加强规划,优化党外知识分子成长路径

1.建立科学的选评体系

培养使用党外知识分子的前提是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人才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要在范围、内容、标准等方面设定可量化、可操作的指标。比如,把参政议政成果计入工作量;建立个人修养及公众形象档案记录,进行纵向环比评价。根据评定结果建立党外人才库,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择优安排,让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做好代表人物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

高校、科研院所等国有事业单位可以先行先试,安排单位内部成绩突出、履职积极、潜力较大的党外知识分子实岗实训,让他们提前熟悉环境、进入角色,为以后的政治安排、社会安排和实职安排提前“热身”。在教代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等工作机构中,注重吸纳党外专家学者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序扩大党外人士的参与度。

3.推广党外后备干部“十百千工程”

要更加注重从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中物色人才。浙江省的“十百千党外后备干部工作工程”和高校无党派人士“青苗计划”是很好的借鉴。建立健全党外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骨干教育培训、培养使用、跟踪管理等机制,把更多优秀的党外青年知识分子纳入统战工作对象。

参考文献:

- [1][9][10][17] 习近平. 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EB/OL]. (2015-05-20).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22/c40531-29660676.html>.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6-4-25).http://www.cac.gov.cn/2016-04/25/c_1118731366.htm.
- [3]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的讲话[EB/OL]. (2017-03-0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04/c_1120569212.htm.
- [4]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 [5][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N]. 人民日报,2015-09-23.
- [7]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
- [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 [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1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鲍跃华

精英民主与和和博弈：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面相及其当代启示

——以“五一口号”为切入点

彭剑鸣

摘要：在政治超然性的指引下，因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经重复博弈的历史条件，政治协商会议表现出精英民主、和和博弈和共识引领下的社会发展驱动机制的原初面相。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面相在当代表现出以精英民主制约普通多数政治民主的特征，通过平衡利益分配、相对主义的平衡发展和构建同心团体继续出发的具体行动，推动中国社会稳定前行。

关键词：政治协商会议；精英民主；和和博弈；当代使命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20-09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凡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随即响应“五一口号”，并由此开创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本文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面相及其当代启示进行讨论。

一、既有研究成果述评

“思考和批判是哲学、宗教、道德、政治以及人类一切活动领域内比较健全的思想所不可缺少的。”^[1]现有文献对因应“五一口号”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 1977 年之前关于政

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基本上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公告、新闻和国际法的文稿，因此笔者将 1977 年作为文献研究的起点，在中国知网以“政治协商会议”为主题，搜索从 1977 年迄今，讨论政治协商会议的研究成果，共获得 7518 条文献。并以研究政治协商会议特征的内容为主线对既有研究文献进行归结。学者们的讨论是开创性的，对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完善大有裨益。

(一) 揭示政治协商会议特征的研究成果概述

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前行是学术研究的通例，故新的文献可以覆盖旧有的研究成果。近年研究政治协商会议特征的文献可以归结为：

收稿日期：2020-07-02

作者简介：彭剑鸣，致公党贵州省委专职副主委、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统一战线。

第一,揭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价值。学者研究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创协商民主新时代,实施协商民主新方略,再创协商治国新辉煌”,而且协商民主贯穿了建国和治国的过程^[2]。

第二,进一步揭示政治协商的协商“具有人民性、界别性、专门性和团结性等特征。”^[3]

第三,揭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性质。有学者研究指出,“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并进一步指出为了发挥政协协商的作用,“需要人民政协进一步提高政协协商水平和能力,推进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明晰政协协商的地位和作用。”^[4]还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逻辑产物,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也是追求中国式善政善治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5]

第四,对人民政协的“协商”进行深入研究。一是讨论了政协协商民主价值实现的方式,论者指出,“充分发挥政协协商的民主价值需要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与时俱进:这不仅需要加强政协协商与社会协商之间的有效对接,同时更需要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通过‘普通公民—政协公民论坛—人民政协’之间的‘上下联动’和‘人民政协—政党—政府’之间的‘左右互动’,共同形成一个‘普通公民—政协公民论坛—人民政协—政党—政府’的‘多维互动’结构。”^[6]二是讨论了协商民主应当具备的规范性条件。论者指出协商民主应具备的规范条件是:“协商主体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协商主体直接参与的广泛化,协商主体参与程序的制度化,协商内容、形式、过程的公开化。……应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条件为指导,逐步实现协商民主的平等参与,逐步实现协商民主的大众参与,逐步实现协商民主的制度化,逐步实现协商民主的公开开放。”^[7]

(二)“五一口号”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结

“五一口号”在新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

1.“五一口号”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具

有重要作用

论者指出,“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8]。而且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政治和历史事件。”^[9]“‘五一口号’中所蕴含的政党协商内在要义对于推动我国政党协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要坚定新型政党制度,二是要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三是要发挥统战智库作用。”^[10]

2.“五一口号”体现了协商的政治精神

论者指出,“‘五一口号’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中,反映了协商、合作、民主等政治理念,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取向,是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11]而且在当代,“秉持‘五一口号’精神,就是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2]

(三)既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1.既有研究成果的主要关注点和主要成就

(1)主要成就

现有研究将“五一口号”的协商精神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恢复了“五一口号”和政治协商会议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初面相。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口号”的发布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贤达对“五一口号”的响应。政治协商会议自然延续了“五一口号”的精神,对二者的分别研究固然有助于深入发掘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内涵,而对二者的联系性研究则有助于提升对这一制度的系统性认识。

另一方面,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现有研究将“五一口号”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推进到新型政党制度的层面,说明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对该制度蕴含的精神内核的归结有利于对协商民主及其作用的发挥继续讨论。

(2)主要关注点

在宏观意义上,现有研究对“五一口号”的主要关注点,是“五一口号”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及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具有的奠基作

用。同时,讨论了“五一口号”对协商民主的价值。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于它对于新中国成立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价值。

在微观意义上,现有研究讨论了“五一口号”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具有的重要价值。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讨论则主要关注了其基本特征,这一讨论内容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当代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2.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

(1)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五一口号”之间呈现弱相关关系

现有研究成果多呈现为对“五一口号”或者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分别讨论,在对“五一口号”和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予以关联讨论时,通常将“五一口号”和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表述的特征:一是将“五一口号”作为深入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过程性的内容;二是重点讨论“五一口号”而将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其结果性内容。

然而,“五一口号”不仅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表达了“政治协商”的内涵,而且也涵括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合理性因素,正是合理性因素奠定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长期存在的基础,保障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当代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故似应将二者合并深入研究。

(2)未对“五一口号”响应者和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者进行社会学考察

既有研究虽然关注了“五一口号”以及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性质,却未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主体的身份状态和协商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考察。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基础,也是其社会属性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社会属性在主体的社会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不仅是主体从事社会活动的内在约束机制,而且反映了其所在社会群体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因应社会身份的符号性质而使其从事的社会活动与该身份相联系,而且

行为人难以在行动中摆脱其社会属性的窠臼。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协商主体的身份及其身份意识,不可避免地注入政治协商活动中,并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而存在,它将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

(3)对“协商”的认识处于默会的状态

既有研究确认了“五一口号”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具有的“协商”特征,但未对“协商”的性质从不同的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角度予以揭示。“协商”作为一种默会的内容似乎并不存在歧义,但是,将其纳入科学的认识范式则有助于充分认识其本质,并通过这种本质属性反映出协商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及其支配下的客观行为反映了政治协商活动参加者的真实诉求;而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共识则是他们真实意图的书面化定型。从这一角度理解“五一口号”和新政治协商会议,更有利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当代发挥作用。

二、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面相

(一)精英共商国是的平台

因应“五一口号”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原初使命是协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故其原初面相是独立于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一种集体决策机制,“大规模群体的政治背景下,那些规定了以何种方式达成集体决策结果的制度或者规则集,它们是对考虑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唯一重要的因素。这些制度和/或规则,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13]故“五一口号”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集体决策集中制的内在精神指引,而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共商国是的平台。

1.参与协商的主体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

因应“五一口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和社会贤达,他们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所在群体或所属社会阶层的“民意代表”,分别代表了所属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对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者的背景进行审视,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故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者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的精英。

2.讨论的问题是国家的基本方略

从“五一口号”的内容可见，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者讨论的问题涵括了政权的产生方式和基本的决策制度；从实际状况而言，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共同纲领》^[14]，确定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管理体制，明确了整个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及其权力内容。并且，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机构和组成人员，这些都是建立国家最核心的内容。

(二)和和博弈的机制

1. 新政治协商会议表现为和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总是由不同的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国家的基本法既是这个国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行动规范，也是该国家权力—权利关系的定型。它不仅涉及这个国家的社会管理结构，而且也是一种利益分配的书面化定型。

在博弈论的视野中，为了确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各个阶层的精英就开始进行博弈，而政治协商会议的展开已经是一种重复博弈的结果，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采取的最优策略就是纳什均衡。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各方参加者就中国社会的演变方向及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采取“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即是以和和博弈的方式照顾各方利益。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和和博弈的核心内容是满足所有群体保障生存权的需求，然后在发展权的保障中实现机会平等。从过程上考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围绕建国的各项内容进行协商，而在宏大命题之下的则是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归结起来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故每一项国是都可视为“民生”的高度抽象化和政治协商参加者共识的定型化。从结果上考察，参与协

商的主体通过和和博弈的方式达成了共识，“所有政治决策规则的讨论都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可行的一致同意’(workable unanimity) 规则的探讨，只是，理想状态与现实可选规则之间的差距太大，以至于使理想状态本身不再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15]显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达成了“可行的一致同意”，且该一致同意被以《共同纲领》的方式记载并作为参与各方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

2.政治协商会议的和和博弈机制具有开放性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者之间的和和博弈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共同纲领》中“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表述，表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具有开放性。从这一视角审视，表明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对一切确认《共同纲领》这一和和博弈制度化结果的爱国民主分子予以开放，由此开启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与时俱进地纳入新生群体和阶层“协商”国是的空间，为该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作用发挥保留了动力机制。

(三)共识引领的驱动机制

1.共识引领下维护自身权利而促进社会发展

“我们主要的不安，来自缺乏‘共识’。”^[16]在共识确立后各参与协商的群体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演变的趋向，以及自身已经得到确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消除不安并在这一共识引领下，在安全—自由、秩序—民主、效率—公正的基本价值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化的社会行动结构中，以各个群体和和博弈的协议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以社会演变趋向为目标，在谋取自身利益的状态下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2.各群体相互协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模式

每一个社会活动的主体都有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然而，每一个人基于自身的权利追求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一个相对演

变缓慢的时代中，这种基于追求自身幸福的行动而推动社会演变发展的模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演变。在一个外界压力巨大而又面临急剧变化的时代，则需要整个社会为了实现一个共识性的目标而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实现共识性的目标和自身目标而相互促进发展。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就是在总体性目标上达成共识，以及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相互促进地发展。这是一种共识引领下追求自身利益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演变的协力行动方式。

三、政治协商会议原初面相的基础

“我们必然是生活在由我们自己的文化所制度化了的那种你我之间泾渭分明的架构中。”^[17]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具象上的精英民主与和和博弈在抽象意义上原初动因的解析，有助于认识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精神内涵并推动其在当代的继续阐发。

(一)中国的精英文化积淀

1. 精英人士的使命感是实现精英民主的内在约束机制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18]在古典意义上，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都被划归“精英阶层”，中国历史文化的精英文化内容并未因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而消散，而是浸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从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考察，社会管理的行动者和领导者仍然是知识阶层。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知识阶层形成了许多的内在约束。他们普遍信守自己作为社会支柱的价值观念，只要一个社会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诉求，知识分子就会对这个社会管理秩序的忠诚视为一个必须信守的底线。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罔顾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就会将满足公众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行动的基本价值观念。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参与协商的基本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知识阶层人士，他们大都具有浓厚的国家整体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为中国传统

意义上的精英，他们也都具有清楚地判断事物演变趋势与和和博弈的能力。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饱尝外侮的境况，使民族精英产生了引领中华民族走出困境的使命感。在精英文化的支配下，他们的行动自然表现为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结合起来考虑，这种使命感成为促使他们共同寻求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展开行动的内在动因。

2.精英的“人性”是和和博弈的底线保证

对中国社会精英代表的知识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他必须对自己所在家族或者族群尽义务。因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往往需要家庭乃至家族付出较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人才在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之后需要对整个家庭乃至家族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了对其家族的直接支持，以及对其家族所在地域关联族群利益的照顾，从而为其所在族群的未来发展保留空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或许正是在这一“人性”的约束下，形成了对公民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机会平等权的共识。

3.精英的谨慎行动保障了和和博弈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具有准确判断当前局势和社会演变趋势的能力，且该能力与其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正相关。因此，精英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通常采取“权变”的策略，而在局势相对稳定时期通常选择“谨慎”的行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中，精英们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致，追求中华民族摆脱外侮而在和平的环境中走向未来，对于自己乃至其所在群体利益的坚持是“谨慎”的，和和结果就成为精英之间博弈的最优结果。

(二)中国的和和博弈历史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以文化和血缘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内部形成了和和博弈的历史文化，并且是否能够秉承和和博弈的历史文化，早已成为判断统治集团是否能够得到拥戴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一旦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赢家通吃而罔顾其他阶层、集团利益的基本权利和诉求，则该统

治集团就丧失了“合理性”而被打上“暴政”的烙印，生存权没有得到保证的一方反抗统治集团的行为，就会成为公众认可的正义行为，统治集团在博弈中丧失既得利益，也被视为“天理昭昭”的正义结果。这一底色文化对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而存在，从而成为各个族群的精英人士博弈时的底线。这种和和博弈的底色文化制约了知识阶层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制约了知识阶层的行动。因此，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参与协商的各个群体的代表都自觉接受和和博弈底色文化的限制而采取行动，每一个群体的代表在主张自己的利益时都必须考虑其他群体的基本需求。

（三）长期博弈的历史结果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各个阶层的精英就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多次博弈，甚至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协商政治的历史实践从清末预备立宪就开始了，历经了100多年”^[19]，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各族群精英之间重复博弈状态下的又一次博弈而已。博弈论的理论表明，在重复博弈的状态下，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最优的策略就是坦诚相待而不是尔虞我诈，博弈的最优结果就是纳什均衡。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新政治协商会议呈现为和和博弈的结果具有科学依据。

（四）政治的超然文化历史

1. 政治联盟需要各个群体的代表彼此兼顾对方的利益

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各个族群之间的利益交织，而各个群体内部也随数量的变化而逐渐呈现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因此，要想维持公共利益集团内部以及利益集团之间所形成的联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需要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在主张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时，都必须考虑兼顾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与实践相关的几乎所有事情中，政府——或更确切地说，参与政治过程的个人——确实拥有强制权。他们的确行使着真正的自由裁量权。”^[20]在博弈过

程中一旦出现某一个利益集团意图以损害其他族群利益而获取利益，对处于绝对弱势的群体而言，他们没有赖以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足够的力量。此时，任何一个强者基于联合各个群体的需要，都可能利用自己的强制力量抑制其他强势群体对绝对弱小群体的欺凌，保障该弱势群体最为基本的需求，否则其政治上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正义性就荡然无存。

2. 政治活动中的强者也需要获得其他群体的支持

无论一个群体多么强势，对于外部群体的联合体而言其数量都只是相对少数，其力量也是相对的弱者。而且，一旦某个群体的人员数量和力量已经使其之外的利益群体在数量上陷入少数、力量上成为弱者，该强势群体内部就会基于认同驱动，在内部分化出“少数”作为核心群体。因此，获得多数群体乃至全部群体的共识是维持政治联盟的基本方式。

3. 政治协商会议体现了政治的超然性

就新政治协商会议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将中华民族的各个阶层和族群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总体目标一致、总体目标和各个群体的目标相互兼容和促进的整体。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群体需要出让一部分利益，为形成新的团结的群体而奠定基础。这一行动特征表现出政治超越一定政治群体的表征，体现了政治的历史使命具有超然性。

四、政治协商会议精神的当代使命

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精英民主秉承的和和博弈精神在当代呈现出新的政治使命。

（一）平衡当代的利益分配

1. 从经济学的视野观察政治活动具有利益分配的属性

从经济学的视野审视，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核心问题，就是设计一种保障社会利益的分配从程序到实质上都处于公正状态的制度，促进社会各阶层可以接受制度确定的社会利益分配方式。

在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中，或许每一个群体都不可避免地希望设计出一种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制度，并通过这种分配制度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现代政治中的短视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帕累托最劣’。”^[21]如果一个在社会管理中处于优势的阶层优先考虑该阶层的利益，必然会出现“帕累托最劣”，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果是在没有其他制约的状态下通过多数票决定的制度确定社会的利益分配，有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被剥夺感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有可能产生被剥夺者和剥夺者之间的尖锐对抗，甚至是社会的撕裂。

2.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可以克服简单多数民主的局限

(1) 简单多数民主存在不完善性

“在保证分配公正方面，普通的多数主义政治是一种极不完善的机制，至少根据对分配公正的传统理解来说是这样。”^[22]普通多数民主政治隐含的内容即是用多数票决定利益分配。从程序上看，普通多数主义的民主政治由多数人投票选择一种制度设计似乎是公正的，尤其是在程序上预先确定了按照参与决策的多数人的选择进行选择的背景下，这种程序公正就更是得到了群体的认可而获得了程序公正。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个非公正的程序问题是，普通的多数决策人群之间，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能完全基于自身的内心选择而做出选择。从结果公正的角度审视，普通多数民主可能蕴含的最为不利的结果就是多数人利用多数人的地位和优势剥夺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对于简单多数民主的决策机制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完善性。

(2) 对简单多数民主政治弊端制约而达致公正的方式，包含了绝对多数民主制约和精英政治制约

首先，绝对多数民主政治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于绝对多数民主制约普通多数民主弊端，依赖于少数群体之间的联盟阻止普通多数民主可能出现的决策不公，但是，其中蕴含的风险也在于，普通多数主体之间更容易形成联盟，因为对于弱者和

强者达成联盟而言，为了形成这种联盟就需要弱者出让自己的利益。如果弱者让渡给强者的利益超过其在普通多数民主中丧失的权利，则弱者不愿意和强者形成联盟；如果弱者让渡给强者的权利少于强者在普通多数民主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则强者不愿意和弱者达成联盟。救济的办法是弱者之间抱团取暖以对抗普通多数的强者，但是，弱者之间达成共识是困难的，因为“达成多边协议的成本比达成双边协议高得多。此外，这种情况下，通常还缺乏为达成协议而发动谈判的动机。”^[23]而强者之间的联合通常是一种双边谈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弱者之间达成共识要容易得多。故绝对多数的制约是一种存在缺陷的保障实质公平的方式。

其次，精英政治对普通多数民主政治决策的制约，寄希望于精英是希望运用其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事物复杂性的判断能力，以超然于自身的诉求而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族群的整体诉求，并能够预先指出普通多数民主政治的具体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或者消极后果，以便使普通多数民主决策持谨慎的态度或者及时调整其决策，从而避免或者消解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

第三，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制约普通多数民主政治局限的一种相对适宜方式。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参与者的精英属性，决定了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利益并从民族的利益、联盟的利益出发考虑整个国家的未来利益，以保障整个国家的发展和长远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共同协商提出照顾各个群体利益的相对妥善的方式，从而平衡各个群体在利益方面的需求和矛盾，为使整个社会平稳地走向未来凝聚共识。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民主可以实现对普通多数民主局限的制约，实现在遵守最低限度生存权准则和发展权机会平等准则的基础上的利益分配，并确定政治方案。

3. 政治协商会议可以缓解社会群体直接冲突的紧张状态

从理论上而言，不同族群在利益分配和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排除参

与多边谈判的各方因具体的谈判事项而产生冲突。在此背景下,为促使多边谈判具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并最终达成共识,就需要有第三方对多边谈判各方之间的协商提供机会,以便推动多边谈判的重启或者继续进行。而精英可以因其出离本位主义的立场而处于“中立”,并以此推动谈判的继续进行。就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由于其精英民主的本相而在当代也体现为主要参与各方都是精英,在普通多数民主机制下各方产生较为尖锐的直接冲突时,精英就可以以一种“中立”的立场与各方分别进行协商与沟通,从而寻找多边谈判主体之间的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点触发谈判各方继续谈判或者重启谈判的动机。

(二)相对主义的协调发展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利益总量通常是相对稳定而有限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方式是且只是理想主义的,故各个群体的利益分配必然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为了避免因利益分配上的差异而导致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就需要将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控制在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

每个历史时期总会存在一个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与该领域相联系的群体就成为获取利益相对多的群体。因此,对于“优先发展领域”的实质揭示就成为控制利益分配差距和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指针,将“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前提予以厘定,成为控制利益分配差距过大、避免矛盾激化的手段。“优先发展领域”通常是指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领域,以及社会利益增长最快而致利益最大化的领域。对于前者而言,因为前期的“优先发展领域”的安排而使与该领域相关阶层或者群体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该利益增长的同时,其他阶层或者群体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利益维持在原来的水平或者增长不多,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差额,此时,就需要通过发展前期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来缩小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对于后者而言,则是指整个社会可供分配的利益已经处于瓶颈阶段时,急需从总体上增长整个社会的财富,从

而为各个群体和阶层创造更多利益。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优先发展领域”,控制矛盾的措施也有所不同。对于前者而言,矛盾控制的对象是既得利益群体,需要采取的措施是遏制其可能获得的利益继续快速增长,同时保障获得利益较少群体的生存权或者是发展权中的平等权。对于后者而言,则是在每一个群体的生存权都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赋予不同阶层的群体发展权,并且通过对“优先发展领域”的确定,将社会发展和一定群体的发展权的实现联系起来,需要采取的策略实则是对发展权的平等赋予而不是将其赋予一定群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决定了生存权的保障、发展权的机会平等是整个社会的管理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对于社会利益的分配只能做到相对公平。

相对主义“就是在不同的看法之间寻求平衡和公道。它的存在是由于有差异的心理因素造成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在寻求政治公道的过程中,它把这些心理因素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以及包容这些心理因素的政治制度加以平衡。”^[24]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精英民主在当代就表现为,促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控制在各个阶层、群体大致能够接受的公平的范围之内,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其发挥该作用的机制是,不直接发挥“决策”和决定利益分配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可以通过“精英的呼唤”或者“精英的警告”促使普通多数民主主体之间和和博弈。同时,由于参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精英与社会各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联系,故他们可以快捷地向普通多数民主机制反馈意见,遏制单边主义倾向,保障整个社会在相对公平和稳定的状态下前行。

(三)构筑同心团体再出发

“科学或政治中的发现活动是在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假设下进行的,这个假设就是:它所探求的东西独立于个人对这种追求的价值表达而存在。……参与者会一致同意:一旦找到了终极目标,所有的努力将用于实现该目标。政治变成了对‘公共利益’圣杯的无止境的追求。”^[25]中华民族的繁衍和

发展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中国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目标。对这两种价值的兼顾成为中华民族得以作为一个整体前行的约束机制。抽象意义上两种价值目标兼容的可能性并不排斥具体意义上两种价值目标的抵牾,而消解该抵牾的方式之一是承认这两种价值的不一致性,并将其中存在的一致性结合起来,将个人的诉求与国家利益一致的部分蕴含在统一的行动策略中,从而实现两种利益的共存和共同实现。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精英民主的本质特征在当代可以发挥其和和博弈的“谈判机制”作用,通过协商的方式寻找各个阶层和群体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共识,并将该共识提供给普通多数民主政治的决策机构,以便于做出合理的行动决策。同时,政治协商会议精英民主的“协商机制”采用和和博弈的方式兼顾各个群体的诉求,既可以兼顾中国人的“面子”,避免由于该因素导致的妨碍合作行为,又可以避免普通多数民主政治产生的弊端而导致的联盟破裂。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追求的虽然是政治目标,但它的入手点却是生活。从社会生活主体的角度出发考察其生存权的保障和发展权的机会平等,社会各界的精英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和和博弈的行动策略,保障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基本权利,为中华民族的继续平稳前行发挥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8.
- [2] 林萍.协商民主的发展进程:从协商建国到协商治国[J].行政与法,2019(11):1-7.
- [3] 张丽琴.政协协商:概念、特征与价值[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4):66-71.
- [4] 顾建军,王柳,曹伟.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创新、问题及优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2):42-48.
- [5] 王洪树,张茂一.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J].探索,2019(5):42-50.
- [6] 谭诗赞,陈捷.多维互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创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2):78-84.
- [7] 白天明,高佳.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探讨[J].理论探索,2013(1):80-83.
- [8] 张广鑫,周焕博.“五一口号”奠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39-147.
- [9] 闫柏良.“五一口号”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25-31.
- [10] 周丹.从“五一口号”看政党协商的内在要义和现实路径[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28-32.
- [11] 成琳.“五一口号”与中国民主国家形态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47-53.
- [12] 王刚.论“五一口号”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15-18.
- [13][15][23] [美]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马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2-143、7、7.
- [14] 韩大元.论 1949 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M].中国法学,2010(5):5-15.
- [16] 曾仕强.说不尽的中国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5.
- [17]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7.
- [18] [美]雅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M].李明良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 [19] 徐湘明.协商民主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
- [20] [美]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征税权[M].冯克利,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
- [21][22][25] [美]杰佛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M].秋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8、144、52.
- [24] [美]威廉·帕·克莱默.理念与公正[M].周征环,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3.

责任编辑:宋好

从“特色”到“新型”: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综述

吴智楠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习近平重要论述。以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发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以及优势,分析其在如何保持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创造性地使中国人民受益其中,辩证地对待制度的优势与现实问题,探究其是如何成为中国为解决世界难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中国方案;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29-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政党制度做了许多精辟论述,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前,学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名称提法主要分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习近平于2018年3月4日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义为“新型政党制度”为分界,在此之后,学者们更多以“新型政党制度”命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实际上,这两种名称提法本质上是一致的,指代同一制度,均为突出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而“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提法是在与世界各国历史上出现过和当今实行的政党制度比较之下,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概括和定位,

使中国政党制度更具世界意义,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提供了极具参考借鉴价值的“中国方案”。因此,本文在学界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主要提法,从该制度的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习近平重要论述六个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分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

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首先要研究这一制度的渊源,厘清其理论基础和历史形成与演进。学界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主要有三: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历史渊源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三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吴智楠,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种渊源的互动与结合，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这一制度发挥出极为突出的活力与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创立了多党合作的理论。杨雪燕认为：“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多党合作的思想具体化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关系的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工人政党、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同时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关系中应坚持的原则，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1]因此，多党合作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民主的、工人的政党开展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抛弃他们，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实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周云莲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这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源泉。”^[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以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为指导，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为将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打下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各政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及广大群众等各协商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公共协商方式参与决策、达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与制度形式。”^[3]协商民主体现在政党制度方面就是政党协商，如今政党协商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协商民主理论的长期积淀。周淑真认为，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要素^[4]。李军鹏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时间基本一致，协商民主理论为政党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5]。肖光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指明了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协商民主理论，创新并超越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创造^[6]。

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黄景睿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等特殊国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中国特定时空规定的‘土壤’中，孕育萌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的政党制度。”^[7]熊必军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正式确立于 1949 年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召开。”^[8]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政党，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李燕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 1944 年 9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9]因此，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有着共同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合作，争取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这成为多党合作的历史根源。田改伟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团结抗日，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结下了初步合作共事的友谊。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各民主党派，一起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10]中国共产党在 1948 年提出“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又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从而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李伟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1]寇政文认为，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基^[12]。齐春雷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多元统一、和谐共生”是多党合作制度产生的文化根源^[13]。学界都比较认同和合文化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影响。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关于现代政党的因素，但

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对现代化政党制度的构建产生事实上的促进作用。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又吻合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形成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和协调、融合的状态”^[14]，因此，这一制度的成功是必然的。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制度下的政党属性，二是分析制度下的政党关系，三是从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中阐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

第一，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属性的探讨。政党属性规定着一个政党的性质。政党的性质决定着政党所组建的政党制度的性质。因此，研究政党制度的性质要研究制度框架内政党的性质。宋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属性与功能^[15]。领导与执政是两种方式，其活动空间也有区别，两者不能混淆。领导是包含更加全面的内容，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事务，而执政仅是指执掌政权。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内容和活动空间要比“参政”的内容和活动空间更全面、更广泛。在这样的政党属性下，虞崇胜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是非竞争性的^[16]。众所周知，竞争性是旧式政党制度的题中之义，旧式的政党为了权力争得你死我活，尽管曾在世界上繁荣一时，但这丝毫不能遮掩其虚伪的本质——资产阶级垄断性专政。而非竞争性正是中国政党制度全新的创造，符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的基本特征，解决了旧式政党制度所无法解决的恶性竞争的问题，为社会的发展注入团结的力量。

第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的分析。政党关系是政党制度框架内政党之间关系的体现。学界一致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架构，在这一架构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而非旧式政党制度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在政局动

荡、社会失序的特殊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不是对立存在，而是有着相同的斗争目标和相近的革命追求，并通过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17]，他们的关系是十分团结和谐的，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宋俭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奋斗目标相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共事关系。”^[18]就中国政党制度看来，中国的政党关系是团结和谐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中国的政党就是如此，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由大家一起商量，具体落到政党上就是政党协商。政党协商是中国政党关系的特点，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典范所在，是旧式政党制度所缺乏的优良品格。尽管西方政党之间存在一定的妥协，但也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只是一时地找到共同点。而中国的政党协商是一直存在的，是经常性协商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友党关系。”^[19]因此，从政党关系的角度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是团结合作。

第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比较是比较政治里常见的类型。一些学者通过形成条件、本质、合法性来源等方面的对比来阐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并力证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形成条件而言，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产物，而西方政党制度是议会斗争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各民主党派经过比较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结

果。”^[20]就本质而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上的,而西方政党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就合法性来源而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既有领导革命成功而来的合法性,也有来自广大人民支持的合法性,而西方政党制度合法性来源主要是选举。因此,从这三个方面看,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主要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

通过政党属性、政党关系、中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研究,形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两大特征。一是在政党制度层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国家,也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实现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二是“在政党制度结构上确立了一个有着广泛政治参与的、开放民主的制度架构”^[2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允许最广大的人民参与其中,各抒己见,能够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开放性是西方政党制度所不具有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整合社会利益,二是提高决策效率,三是实现民主监督。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社会利益整合。整合社会利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的功能。“整合是指通过一定方法和手段,使各自独立而又有一定联系的要素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进行调整和协调,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和结果。”^[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政党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齐春雷认为,改革开放促使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多元利益需要整合,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整合多元的利益提供良好的政治平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就可以诠释为利益协商保障、吸纳多元利益诉求、增进利益协调共识^[23]。姜丽华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要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保

持社会和谐稳定。”^[2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利益分化比较严重,而中国政党制度就使得多元的利益得到有效的整合,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齐春雷还认为,民意代表的全面性与时效性是民主的难题,而中国政党制度解决了这一难题,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民意代表具有全面性、民意整合具有时效性^[2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制度运行时能及时整合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是现实的需要,其产生有充分的合理性,也是政党制度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功能。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决策效率提高。提高决策效率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一。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个标志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政治协商,达成政治共识。只有各党派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在具体目标、任务、路径等方面达到一致,才能将决策效率提高。魏晓文、苏杭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秉持求同存异之原则,在政治资源优化中互相支持、协同共进,形成温和有效的对话方式和资源优化共建机制^[26]。这样的有效对话方式和资源优化共建机制有利于政治资源的整合,从而使决策效率得到提高。黄玉认为,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增进共识就是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通过共识形成,执政党把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有效转化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理想,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思想根基^[27]。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每个主体所要求利益的不同,这是多样性的表现,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就是在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即通过政治协商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从而实现每个主体基本一致的利益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制度为政治协商与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较为现代化的政治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设计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决策效率的提高。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民主监督实现。实现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一。姜丽华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28]民主监督体现了制度的政治包容性。钱文华、胡政宏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遵循的方针,是民主的重要体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是制度框架内的相互监督,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民主价值,体现巨大的政治包容性^[29]。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拥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李金河认为:“参政的民主党派有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弥补执政党在决策过程中的不足。”^[30]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发挥其民主监督功能时所产生的优良效能。齐春雷认为,对权力实施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权力监督具有自律性和民主性^[31]。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较强的纪律约束,而在党际间,各民主党派积极履行其民主监督的职能,促进制度下的民主监督。中国的参政党,拥有较为超脱的政治地位,较少受区域或集团利益的干扰,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地提出批评或建议,为民主性的权力监督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学界认为,实现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民主,二是政治稳定,三是文明贡献。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之一。陈诚、刘诚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局部执政时期,不仅努力实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民主,参加国家政权建设,同时也努力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协商民主由此发展,在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为新中国建

立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2]这与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制度设计远远不同,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上。王维平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和实现形式之一,与西方政党轮替制度相比,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33]。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既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与政治社会稳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之一。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何制度的设计与建立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就是促使政治稳定,这成为制度的政治优越性。雷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形成最稳定的政治基础,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稳定^[34]。政治稳定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国家大事不当作自己的私事,有事就与民主党派共同商量,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变的,是永远不变的”^[35]。在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与旧式政党只注重眼前利益甚至朝令夕改不同,以百年为尺度思考民族命运,以一棒接一棒接力向前的坚韧推进国家战略,这种政策的稳定性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稳定优越性的彰显,使中国在经历种种艰难曲折而始终挺立时代潮头。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局限性,为人类政治制度文明贡献良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36]。雷蕾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集中体现了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重要启示,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构建与国情、民情、传统、文化相一致的现代政党制度展示了中国方案^[37]。周淑真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

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和有效率，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38]。王洪树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3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结构下，以合作、协商为导向，既有对各方面利益的整合，也有对社会稳定发挥作用，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相互攻讦、恶性竞争的弊端。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其最大创新之处在于与旧式政党制度的截然不同，不仅代表多数人的利益需求，而且符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程序。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制度设计创新方面。李仲才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把握国情、服务民众、一心为公、政党之间信任以及相互监督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40]。把握国情，从实际出发，是制定政策、高效决策的必然要求；服务民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充分相信和接纳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事，为民主监督开拓渠道。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政党关系创新方面。刘晓辉、吴祖刚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之根本是中国特色政党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都有显著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41]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先进性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从本质上就具有变革性。”^[42]中国特色政党关系既是执政与参政，也是领导与被领导，这种关系与旧式政党制度的执政与在野关系截然不同，其先进性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彰显出特点和优势。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制

度后果评价方面。学界之所以普遍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原因在于如周淑真所言：“它是一种‘合作-协商-合作’的方式，这种设计减少了在一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由于竞争造成政治内耗和社会秩序混乱期的频繁出现，提高了政治效率和政策的执行效率。”^[43]取得这样的积极评价，证明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了足够的政治权威并引导政党关系和谐发展。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引领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展示的实践成效和体制创新取得了较为积极且普遍的制度后果。

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来自政党之间关系处理与政党内部建设，如民主党派发展不足、参政党建设理论滞后、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力弱、一些执政党领导干部对制度认识不足与对多党合作不重视等。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引领时代的发展。在问题与挑战面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

第一，政党与国家关系处理方面。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存在紧密关系，政党制度决定着政党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绩效。艾明江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正是源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构建与发挥，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凸显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又兼顾和整合了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以及群体的重要力量，从而全面实现了执政党的轴心引领与参政党的广泛参与，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稳定性与创造性。”^[4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必然使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第二，政党关系处理方面。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是提高制度效能的主要途径，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至为重要。邸乘光认为制度完善途径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坚持改革创新，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二是坚持正确方针原则，完善运行机制；三是发挥和拓展功能，完善和优化结构；四是培育民主和谐氛围，增强社会影响^[45]。实践证明，

只有抓住制度的根本，才能保持制度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长期不变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地位长期不变。

第三，实践与理论关系处理方面。矛盾总是存在的，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实践与理论互动式推进。孙宝华认为，要在多元路径构建中书写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新风范：一是坚定思想导向，夯实政治基础；二是凝聚共同意志，提升理论效能；三是创新研究路径，构建理论体系^[4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仅要将制度的实践提炼为理论，而且要通过创新理论推动制度实践的发展。

六、习近平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等特点、优势等方面做了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出一系列新论述，指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以下简称“3·4”讲话）。“3·4”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首次阐明“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老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提法’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精辟概括。”^[47]学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在“3·4”讲话后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对“3·4”讲话的评价比较积极，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称呼大多改用新型政党制度。这也是为了突出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为代表的旧式政党制度的不同。

第一，关于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述思想化研究。学界把习近平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上升到思想理论层面。将新型政党制度论述思想化是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实践凝练成为全新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张峰林、唐琼认为，研究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可以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这五个方面解析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发展规律、本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要求、基本立足点^[48]。这显示了习近平新型

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深度和内涵。顾榕昌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预示着一种民主政治新理论，在实践上蕴含着一种政党制度新模式和一种政党制度评价新方法^[49]。在创新性上，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上升为一种全新理论。贺先国、刘政权认为，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在于“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想政党政治的中国方案。”^[50]这为将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上升为理论提供重要依据。孙信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同时也为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51]。可以预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对将来新型政党制度思想的形成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关于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关联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聂月岩、侯辰龙认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政党协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性质、内容、形式、主体、特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的深刻阐述^[52]。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其重要性既体现在对协商民主的贡献上，也体现在对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构建上。

第三，关于习近平多党合作的论述研究。多党合作理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就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多党合作理论的创新。基于此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多党合作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提出了关于多党合作的一系列新论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理论化增添新内涵。李德虎从内涵意蕴、创新维度、实践向度解析了习近平在多党合作方面的重要论述，认为这些重要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中国化，推动了新时代多党合作

事业的深入发展。^[53]因此,多党合作的论述是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特点与方向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特点与方向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数量井喷式发展,但质量有待提升;二是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但完整的研究体系有待形成;三是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着手,但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把握。

第一,理论研究数量井喷式发展,但质量有待提升。以中共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搜索,学术论文的数量分别为450余篇和676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后,有关中国政党制度的学术论文呈现井喷式发展。尽管如此,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却占比不高。究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做出新论述,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上还需更加深入,学术论文整体质量有待提高。

第二,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但完整的研体系有待形成。正如本文解析,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其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等方面着手展开,意在以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有一定数量的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学术专著出版,但从总体性的角度解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成果比较少。而“3·4”讲话以来有关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专著较少,许多研究成果以报纸和期刊的形式出现,一些研究较为空泛,深度解析不足。因此,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形成完整而体系化的研究任重道远。

第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着手,但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把握。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国内外政党制度比较和中国政党制度独有发展逻辑为宏观视角,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

特点和优势。然而,学界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具体机制运行和制度设计成效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使得大多数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运行与基层实践了解甚少。若能够从微观层面以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切入点,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与运行程序。

综上分析,下一步研究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向和重点在于:第一,形成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研究,深入研究其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加强制度的理论性阐释,让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史和政党政治理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着重落实新型政党制度的微观实践研究,细化到中央与地方的多个层级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互动案例,总结实践经验,反馈制度实施成效,为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新思路。第三,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不仅要从中国实际国情中提炼经验,而且要在与世界文明的政党制度比较中汲取可学习借鉴的优秀成果,不断与世界和时代接轨,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性时代性和中国的政治话语权,促进更符合人类未来需求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 [1]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杨雪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研究[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6):16-24.
- [2] 周云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述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3):29-36.
- [3][5] 李军鹏.70年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和制度创新[J].人民论坛,2019(27):34-36.
- [4] 周淑真.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要素[C].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统战工作条例与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研究论文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论文集(第八辑).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2016:224-227.
- [6] 肖光荣,李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4):5-10.
- [7] 黄景睿.新型政党制度生成与成长的基本逻辑[J].广东省

-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41–45.
- [8][14][17] 熊必军. 制度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7、16.
- [9][19] 李燕奇.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新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5、136.
- [10] 田改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3):51–59.
- [11] 李伟.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J].人民论坛,2013(9):46–47.
- [12] 寇政文.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与建构路径[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27–32.
- [13] 齐春雷.和合文化视域里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J].攀登,2017(1):2–7.
- [15][18] 宋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属性与政党关系[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9(4):24–29、115.
- [16] 虞崇胜.非竞争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9(2):21–24.
- [20] 施雪华.中西政党制度比较及其启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6):98–104.
- [21][22] 房宁,杨海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第 2 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56、358.
- [23] 齐春雷. 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利益整合功能的拓展[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22–25.
- [24][28] 姜丽华.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整体效能[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5):35–38.
- [25][31] 齐春雷.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基于政党制度的视角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34–38.
- [26] 魏晓文,苏杭.新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及功能优势[J].理论探讨,2018(6):43–49.
- [27] 黄玉.在新时代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37–38.
- [29] 胡政宏,钱文华.中国政党制度政治包容性的价值[J].教育教学论坛,2017(1):36–37.
- [30] 李金河.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民族复兴的制度载体[J].山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16–22.
- [32] 陈诚,刘诚.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有优势[J].红旗文稿,2018(9):31–33.
- [33] 王维平.国际视野下的新型政党制度[J].群言,2018(7):16–18.
- [34][37] 雷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新论断[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1):69–75、108.
- [35]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 [36]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界委员[N].人民日报,2018-03-05.
- [38] 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6–13.
- [39] 王洪树.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多视角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26–33.
- [40] 李仲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70 年发展的启示[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5–10.
- [41] 刘晓辉,吴祖刚.当代中国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0.
- [42] 亓光.伟大的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基于“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J].社会科学研究,2019(5):25–32.
- [43] 周淑真. 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17.
- [44] 艾明江. 嵌入型逻辑: 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经验[J].理论与改革,2019(5):36–49.
- [45] 邱乘光,贾绍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3):3–11.
- [46] 孙宝华,张伟.新时代推进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几点思考[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3):16–20、44.
- [47] 崔建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中国逻辑”论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8(12):18–23.
- [48] 张峰林,唐琼.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思想的五种思维方式解析[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21–24.
- [49] 顾榕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范式研究——基于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视阈[J].广西社会科学,2019(7):14–21.
- [50] 贺先国,刘政权.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思想的理论特征、现实考察与践行要求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19–24.
- [51] 孙信.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14–19.
- [52] 聂月岩,侯辰龙.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6):5–11.
- [53] 李德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多党合作方面的重要论述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5):79–85.

责任编辑:龚万达

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 机制性安排刍议

朱毅民 朱洁 许昆峰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做出机制性安排。本文就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简称: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机制性安排进行研究。在理论层面,从党派制度、政治平台、制度安排三要素进行分析,阐述了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相关原理,提出了构建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保障机制的四点思考。在实践层面,通过分析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存在的四个现实问题,提出改进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六点工作建议。

关键词: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发表意见;机制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38-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做出机制性安排。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好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作用提出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以下简称: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对于发挥政协制度优越性和创新政协工作机制,以

及促进民主党派建设和有效履职,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相关原理探析

人类社会的治理过程,是由统治向民主治理演变的过程,其中,政党制度的建立,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重要。因此,对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体制机制的研究,需要从政治平台、政党制度、制度安排的层面探讨,进而认识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相关原理。

(一)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的演变回望

人们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这一政治现象,随着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朱毅民,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民进江苏省委专职副主委;朱洁,淮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许昆峰,民进江苏省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

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不断演变。

1.个人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

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国家的统治以君主帝王制度为主，属于独裁统治制度，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党派存在，只有个人直接向执政者或通过有限的政治平台建言。

2.政党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产生了政党制度和相对应的政治平台。个人发表意见也逐步转变为党派发表意见，但个人发表意见仍然存在。政治平台也相对地形成议会等会议制度。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不同政党在议会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治理。

3.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

在社会主义中国，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既是现代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制度创新，是政党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贡献。

(二)党派发表意见的三要素

无论是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还是其他形式的党派发表意见，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政党制度、政治平台、制度安排。

1.政党制度

没有政党制度，就没有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的政党主体。就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党(党派)制度来讲，有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君主国家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等类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话语权优势，鼓吹其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否定和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多年的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辉煌成就、特别是2020年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充分证明中国的政党制度是成功的，为各党派发表意见创建了一个良好的政党制度基础。

2.政治平台

政治平台是党派发表意见的必要条件，没有

政治平台，即使有再好的政党制度、再多的政治党派，也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政党发表意见的政治平台各不相同，除各种政治会议、资政活动(论坛)外，较为普遍或被西方国家推崇的是议会平台，成为西方国家政党发表意见、激烈交锋的主要场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政党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其他参政议政活动，成为党派发表意见的有效政治平台。

3.制度安排

有了党派制度和政治平台，并不等于党派在政治平台的发言机制就自然会发挥积极作用。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党派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或者效用低下，或者没有效用，或者不允许发挥作用，或者是发挥反作用。党派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是“党派制度+政治平台+制度安排”的有机整体，要实现党派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的生命力、有效性，三要素缺一不可。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有效地将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平台相融合，由此构建了“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良好政治“生命体”。

(三)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机制分析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平台发表意见，不仅符合上文所陈述的“政党制度+政治平台+制度安排”三要素构成的体系，而且还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对于民主党派在政协平台发表意见，会产生特殊的影响和作用。一是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政协平台发表意见，初衷是友好合作、建言献策、平等协商，而不是相互竞争、互相斗争；二是容易形成政治合力，有利于政协平台的有效运转和作用发挥。

2.人民政协平台机制

人民政协平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平台，不是国家权力机构，不涉及对国家建设和发展重

大问题的决策和表决。因此，政协平台对党派发表意见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政协平台更具有开放性，允许更多的参政议政主体在政协平台发表意见；二是政协平台更具有灵活性，既可以是政协大会、常委会发言，也可以是专题协商、界别协商等协商发言，还可以通过政协提案、社情民意发表意见；三是政协平台的非决策表决特性，有利于营造更宽松的环境和提供更充分的发言时机。

3. 党派发表意见制度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制度体系，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在这些制度体系的保障下，有效地保证了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机制运转。

二、构建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保障机制的基本路径

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体制机制，符合民主政治发展、政党制度建设和政党在政治平台发表意见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了政党制度、政治平台（政协平台），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体制机制并不会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健康发展。因此，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生命力，还需要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支撑，对此提出四点思考。

（一）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

作为一项政治活动，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首先应当有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商国是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对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作了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

发挥其在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积极作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主要形式包含“在政治协商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组织的视察调研中提出意见，或者以提案等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等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为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和保障，各民主党派通过多个政治平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人民政协是其中最主要的政治平台之一。

（二）政协平台的制度安排

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近年来，中共中央通过系列文件的形式，对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平台上的履职做出了明确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可见，民主党派参加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等相关的会议和调研，并在这些会议和调研中发表本党派的主张，成为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主要渠道。

（三）民主党派的履职尽责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代表性广泛，其成员主要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界及台湾地区和海外侨胞的中高级人士等，他们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是其在政协平台上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的重要形式，在实施时需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较充分的文字材料准备，有时还需要组织广泛和深入的调研。一些拥有民主党派身份的政协委员，经过本党派组织认可，在政协特定场合上的发言，也应列入代表本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范畴。回顾人民政协成立 70 余年的历程，各民主党派始终是活跃在人民政协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它们充分发挥自身界别特色和优势，以做好人民政协工作为己任，在政协平台上履职尽责，积极发声。据统计，仅“自 1990—2005 的 15 年中，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针对经济社会问题共提出 9 万多条意见和建议，其中许多意见转化为政府文件或成为政府决策的有益参考。”^[1]以民进为例，截至 2019 年 9 月，“在全国政协议政平台上，自第八届委员会有党派提案以来，民进共报送党派提案 499 份。自 1991 年评选优秀提案以来，民进共有 91 件提案入选。”^[2]

(四)工作机制的有效保障

进入新时代，建立各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工作机制，已成为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规范工作程序，提升工作质量的迫切需要。总体来看，全国政协在工作机制建设上做出了较好的表率，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全国政协制定了一系列办法、条例，对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所涉及的内容都做出明确的规定，通过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建立起相对科学的工作机制，保障了民主党派在政协履职的有序开展。同时，上级政协应当加强对下级政协的工作指导，推动省级以下人民政协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三、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存在的现实问题

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是一个“政协+党派”的体系。因此，分析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存在的问题，需要在智库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分别从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两个层面进行剖析。

(一)民主党派智库目标定位不够明晰

民主党派智库功能定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服务决策者意识不强。一些地方的民主党派乐于追求在重要会议的到场、重大活动的出场，而在政协会议、政协活动中发表高质量的意见、为党委和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方面，则相对欠缺。有的民主党派在政协全委会的大会发言，既缺少创新观点，也缺少可供具体操作的实质性内容，使得党委、政府领导，以及一些部门领导出席政协会议收获较少。

第二，关注决策者需求站位不够。有的民主党派领导缺少政府领导和部门领导岗位的实践，缺乏党政领导决策思维的认知，加之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深入研究分析不够，不能了解和把握决策者的建言需求。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活动）的发表意见，就是自己的知识产品，如果不能把握决策者的需求，建言献策就难以被党政领导所采纳、认可。

第三，研判决策者需求不足。在不了解党政领导的决策需求的情况下，有的民主党派深入研判党政领导的工作思路、工作要点、重大决策等方面不到位，只满足于自己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导致自己的建言献策与党政领导的决策始终未能同频共振。

(二)民主党派机关工作质量不够高

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前期准备工作，从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上报和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准备。按照工作流程，主要有以下三个环节：信息获取-信息加工-成果遴选，对此，就民主党派两大类工作存在的不足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上报工作面临的问题。一是在信息获取环节，党派成员缺乏捕捉社情民意信息的意识和敏感度，缺乏调研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二是在信息加工环节，对信息汇总、分析能力不足，未能从上报的众多信息中进一步提炼、加工出高质量的信息；三是在成果遴选环节，服务上级部门信息上报的意识较强，服务信息提

供者的意识不足。

第二，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准备工作面临的问题。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发表意见，通常是以会议发言的形式体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信息获取环节，征集政协会议发言材料的信息发布不及时或没有发布，使得党派成员来不及调研和撰写材料，党派机关开展专题调研不够深入；二是在信息加工环节，由于党派机关干部能力不足，材料加工提升不够，难以撰写出高质量的发言材料；三是在材料遴选环节，未能建立起择优遴选的机制，把上报、推荐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当作照顾他人的荣誉、政绩利用，存在照顾关系上报材料的现象。

（三）政协征集各民主党派建言意见选优能力不够强

政协机关征集党派社情民意信息和会议发言材料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对党派发表意见有直接影响。

第一，政协征集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不足。有些地方政协在社情民意信息编辑、上报工作中，一是审稿水平不足，不能发现党派上报的高质量信息，或者忽视具有较高价值的短小信息，影响了党派上报信息的积极性。

第二，政协征集会议发言材料工作的不足。一是将征集会议发言材料作为例行公事，通知下发过迟，不考虑各党派开展调研的必要工作周期，使得党派调研时间仓促、材料质量不够高；二是遴选发言材料不以质量为第一标准，注重照顾发言单位，固定党派和下级政协发言，使得一些党派尽管有多篇高质量的发言材料，也只能有一篇入选。

（四）县级民主党派组织的缺位

目前，民主党派只在市辖区设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多数县（市）没有民主党派组织，在县（市）政协的相关参政议政平台，也就不会有民主党派代表在县（市）政协发表意见的制度安排。

四、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创新实践思考

民主党派在政协发表意见的制度机制建设，既要从政协工作方面改进工作，更要立足于党派工作的创新和优化。对此，从六个方面提出工作建议。

（一）改进政协社情民意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编发“信息集”社情民意。打破每份社情民意信息只上报一个主题内容的做法，无须每份社情民意信息都追求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可以在一份社情民意信息中同时编报多个信息，每个信息可以是“小精灵”篇幅，形成“信息集”的社情民意。

第二，完善社情民意信息激励机制。一是建立信息采用告知制度，每份社情民意信息，均应以适当形式告知信息提供者；二是信息被采用进一步上报上级政协，也应当向信息提供者送达信息用稿通知；三是上报信息得到领导批示，均应反馈给信息提供者；四是设计喜庆、精美的贺信，对获得不同层次领导批示的社情民意，向信息提供者送达贺信。

第三，建立社情民意信息上报发布制度。定期发布各单位、个人在社情民意信息上报方面的工作成绩，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二）改进政协会议各民主党派发表意见的征集工作

第一，确立“课题调研-材料上报”的工作周期。政协全委会、专题协商会、界别协商等会议发言材料的征集，应当充分考虑民主党派为完成发言材料所需要的调研时间，将会议发言材料征集视为一个“课题调研-材料上报”的工作周期，提前下发会议发言材料征集通知。

第二，尊重各民主党派发言材料的文字语言风格。政协机关在审查民主党派上报的会议发言材料时，重点把握材料的政治方向、基本观点、用法措辞，尽量尊重发言材料的文字语言风格，使政协会议发言更具“辣味”“咸味”。

（三）改进政协机关服务各民主党派建言的服务

第一，县（市）政协为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积极提供平台。针对不少县（市）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现状，县（市）政协应通过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县（市）党派成员代表人士的建言献策作用。

第二，政协机关为党派获取信息创造条件。各级政协机关在开展调研视察等活动时，可以吸收

民主党派参加，使党派干部能够广泛获取相关信息，从而为民主党派撰写调研报告、建议材料、大会发言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三，政协机关专委会与党派机关结对合作。政协机关各专委会可以与民主党派机关分别建立起结对合作关系，围绕政协工作，共同开展重点课题的调查研究，共同准备政协会议的发言材料。

(四)探索提高民主党派发表意见质量的新机制

第一，坚持和创新信息上报考核机制。坚持党派组织信息考核工作和定期通报信息上报情况。一是建立信息上报工作数据库，掌握下级党派组织中信息工作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联系方法；二是及时与“考核失灵”党派组织所属的信息工作积极分子联系，并与他们建立起直接的信息“专线车”；三是对通过信息上报“专线车”做出突出工作成绩的党派成员，在信息工作评比表彰时可以指定表彰。

第二，以等级评定助力信息员队伍建设。以省级民主党派信息员等级评定机制为例，设立特级、一、二、三级信息员等级和各等级对应的信息工作成绩分值，对照分值评比对应等级信息员。各等级信息员名额不设比例和指标，鼓励所有党派成员积极参评，争当高级信息员。

第三，构建发言材料和信息征集激励机制。在开展优秀信息评比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设立信息用稿通知、信息被上级采用证书、信息被领导批示贺信等激励机制。

(五)加强民主党派专题调研能力建设

第一，构建精准调研机制。一是超前做好准备工作，在专题调研开展前认真进行信息收集和研判，提前制定调研工作计划、下发调研通知；二是调研座谈和考察视察要深入，尽可能广泛接触基层单位同志，获取充足的信息量；三是调研报告（建议）的起草、讨论、修改、定稿过程应当多组织调研组成员交流讨论，必要时可组织专门的学术研讨活动。

第二，构建“头脑风暴”合作机制。“头脑风暴”合作机制是指参加重点调研课题的调研组成员，每人都应当有“头脑风暴”成果——至少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以类似“头脑风暴”的形式汇聚调研组成员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篇主调研报告+多篇子调研报告”的成果形式。

第三，构建持续系列调研机制。持续调研机制就是针对某一领域（行业）的内容，连续多年开展调研，形成系列的、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为政协会议建言献策储备高质量的发言材料。通过持续调研，不断积累信息和业务知识，探索内在规律，使党派干部由外行变为内行，形成系列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六)建立党派“调研研学”机制

将调研能力培养与党派调研工作有机结合，设立“调研研学”机制，在调研过程中培育党派干部。一是建立3—5年为一届的“党派调研研学”培养学制，将每个调研课题作为一门必修课，调研报告作为必修课的“作业”；二是将每次调研的座谈会、实地考察（视察）视为“上课”，每年参加调研的累计时间相当于每学年的“总课时”；三是每个党派干部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调研并完成相应的调研报告；四是每年给党派干部布置适当的理论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的阅读量；五是每届届满之前对党派干部进行“调研研学考核”，以调研成果为考核评价基础，最终决定党派干部通过一届的调研培训和学习是否准予“毕业”。由此，通过“调研研学”机制，培养出一批适合党派工作需求的研究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中国的政党制度》五大亮点[EB/OL].(2014-06-26).<http://news.cn/systwm/2007/11/16/0056734558.shtml>.
- [2]蔡达峰.在新时代人民政协舞台上凝聚智慧和力量[J].中国政协,2019(18):30-31.

责任编辑：龚万达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

卢婉春

摘要: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收官之年,民主党派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察实情、建诤言,充分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独特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从加强政策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敢举善举“尚方宝剑”,强化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力度;树立良好作风,突出民主监督“精准度”;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民主监督实效;凝聚党派思想共识,加强党派自身建设;发挥参政议政职能,利用好人民政协制度平台;强化专题调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整合资源优势,发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等八个方面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脱贫攻坚;独特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44-0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充分看到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三大攻坚战”的严峻挑战,尤其“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必须跨越的关口和必须打赢的战役。2020年初,习近平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进一步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需要凝聚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1]

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收官之年,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和挑战。越是艰险越向前,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各民主党派越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围绕中

共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察实情、建诤言,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充分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护稳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一、民主党派的独特职能对推动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和作用,首先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形式和平台。十八大以来,随着协商民主建设的全面推进,全国政协率先启动“双周协商座谈会”,示范带动全国各级各地政协陆续建立了月协商、双月协商、专题协商等多种形式的

收稿日期:2020-07-15

作者简介:卢婉春,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协商议政制度，并根据党委、政府年度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逐步形成了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年度协商计划，按计划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活动。这一制度的积极探索和广泛建立，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有力抓手，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了有效载体，极大促进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广大政协委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交流、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凝心聚力提供了协商平台，也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改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民意基础。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需要广大有识之士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充分发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2]，“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问计于民、倾听民意至关重要，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力量之源。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汇聚了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激发和引导他们的政治自觉性与参政主动性，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是凝聚全社会力量的最大公约数，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门做出重大部署，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对进入“倒计时”的脱贫攻坚工作再次发出“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4]的总攻令。长期以来，习近平论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时，强调指出两个“重中之

重”，即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5]，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6]。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和使命。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民主党派不仅不能缺位失位，更要发挥各自优势全力以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赋予民主党派一项新的重要使命：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7]。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中共中央赋予各民主党派的一项新任务，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新领域^[8]。这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一次开创性的监督，第一次开展对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民主监督。民主党派在实施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和重点难点问题，精心谋划，有序开展，深入了解扶贫工作精准度、群众满意度，发现脱贫攻坚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初步探索了民主党派开展重大专项民主监督的方法。同时，把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密切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振兴乡村的提案议案，既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又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二、民主党派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基本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甘肃为例，在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精准扶贫工作中，全省六个民主党派紧紧围绕全省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关键领域，以补短板、转结构、促发展为出发点，就扶贫扶志扶智、招商引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党代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深入调研，建有用之言，献务实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都是典型的。”甘肃是“三西”扶贫和全国区域性扶贫的重点省份之一，全省86个县（市、区）有58个被纳入六盘山、秦巴山和藏区三大集中特困片区，还有17个省定插花型贫困县，

6220 个贫困村有 80% 集中在极端干旱区、高寒阴湿区和土石山区,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各种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大、市场发育程度低、群众脱贫难度大^[9]。如何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对欠发达的甘肃省来说,是当前面临的巨大严峻挑战和最大政治任务。

近年来,甘肃各民主党派围绕省委省政府“六大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动、精准脱贫“七个一批”、贫困户“一户一策”、干部户联系帮扶等脱贫攻坚重大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积极开展调研视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一是各民主党派先后邀请党派中央领导来甘肃视察,围绕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进一步支持甘肃引洮工程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形成建议报告,借助民主党派中央通过主席建议信或中共中央有关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等形式和平台,向中央高层提出政策建议,为甘肃扶贫开发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二是各民主党派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组织专家学者实地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可转化的调研成果。民革省委会《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提案》,民盟省委会《关于加快建立甘肃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采纳;民建省委会《关于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与建议》,被吸收到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六盘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中;民进省委会《关于推动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治理规划的建议》,促成了总投资 63.63 亿元项目的落实;农工党省委会从扶贫教育角度提出的《关于尽快组建甘肃医科大学的建议》,促成了甘肃中医药大学项目列入甘肃省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九三学社省委会《关于实施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的建议》,获得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并通过水利规划院的审查,报送水利部。三

是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分别联系 1 个贫困村,结合帮扶行动和扶贫开发,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天然林资源保护、大力促进光彩事业发展等工作中,利用“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活动等载体,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培训、医疗公益救护、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建设、中药材种植加工、健康心理咨询、地质灾害防治、水环境监测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九三学社省委会针对联系点卓尼县藏巴哇乡生态环境脆弱的实际,通过多方努力,积极落实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资金 1580 万元,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民盟省委会实施“烛光行动”,先后筹集资金数千万元,举办培训讲学活动 400 场次,使贫困地区 6400 多名教师受益;民建省委会引进捐助资金 150 万元,在和政县、静宁县、陇西县等地建立了 5 个“思源·教育移民班”;民进省委会推动实施“手拉手”助学活动,累计投入资金 286 万元,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民革省委会引进“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项目,在全省推广 3200 多亩;农工党省委会在贫困地区坚持开展送医送药、义诊咨询等活动,2 年内义诊 1200 多人次,帮扶重建乡镇卫生院 8 所。

在下功夫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甘肃省各民主党派还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科技创新、互联网大数据应用等事关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提出了许多优质提案,为推动甘肃全面发展、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应看到,甘肃各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自我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从客观上来说,扶贫工作进入到决战决胜的冲刺攻坚阶段,所面临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难度更大、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使各民主党派在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这一高强度和高难度工作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产生了能力与期望的“落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乡村经济开发、产业发展的需要与乡村人口素质低、对外协调能力弱、现代经济信息对接能力低等问题的交织存在,使各民主

党派感到脱贫攻坚“协调与帮扶难度大”。

从民主党派自身来说，思想建设上存在理论创新不足、自我治理和自我管理的主动性不够等问题，基层成员参政党角色认知和参政议政意识不强，缺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基层组织建设上存在组织涣散、制度建设相对薄弱、成员老龄化、党派界别趋同、综合知识结构欠缺、组织生活次数少、组织活动形式单一枯燥等问题；工作方法上，有些调研工作“深、实、细、准”不够，有些对策建议缺乏操作性，有些意见建议不敢一针见血，闪烁其词、浅尝辄止，存在怕得罪人的心理，与中共中央要求的“察实情、讲实话、献实策”“善议政”有一定的差距，制约了民主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开展参政议政活动时，对党派组织合力与组织资源整合不足，有效发挥党派团队力量不够，专题化、专家化、专业化运作模式尚未完全形成，重点提案的前期调研不够，有重大影响和重大贡献的提案仍然偏少。建言献策政治站位不高，从宏观和大局上把握议题课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对民主党派提高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效能的思考和建议

(一)加强政策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民主党派要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深理解习近平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型政党制度等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新精神新要求，深刻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注重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参政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践行科学理论的能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贯彻落实民主党派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精神，创新工作方法，不忘合作初心，凝聚力量智慧，把中共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意志、决策部署、政策措

施变成民主党派助力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二)敢举善举“尚方宝剑”，强化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力度

中共中央赋予民主党派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职能，不是为了“作秀”，而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特色和优势的彰显，目的在于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这一伟大壮举伟大事业。因此，民主党派要敢于举起这柄“尚方宝剑”，心中要有“底气”。在敢于“举剑”的同时，还要善于“举剑”。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有别于共产党党内监督模式，民主监督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时，针对如何解决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如何更好地推动工作的开展，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建设性或批评性意见建议，意见建议要把问题找实，把差距找准，把根源找清，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益，从而提高意见建议的采纳率，提升民主监督质量，促进脱贫攻坚稳步推进。扎实推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开展，明确监督重点，聚焦坚持目标标准、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实效开展民主监督，促进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三)树立良好作风，突出民主监督“精准度”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强调的干部队伍建设要求，贯穿到包括民主监督在内的脱贫攻坚的全过程，用良好的作风保障民主监督的成效。实施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要提前谋划，预先做好功课，减少随意性，突出针对性，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精准监督。既要善于抓住事关脱贫攻坚战全局性、根本性、原则性、长远性的“牛鼻子”问题，又要善于抓住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改变农村面貌、推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住房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产业扶贫等问题，开展监督和服务工作。开展民主监督要讲究“细、严、深、实”，切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按照习总书记“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10]的要求，多用放大镜，

不用望远镜，把大事“监”深，把小事“监”细，努力做到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满意。

(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民主监督实效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能否“监”到点子上、“督”到关键处，对脱贫攻坚整体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围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贫困县摘帽、脱贫攻坚责任制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等情况，以及任务落实是否彻底、政策衔接是否顺畅、保障措施是否配套等问题，对标对表，量化问效，寻找薄弱环节，研判解题方法，倾听群众意见，关注群众感受，把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调研起来。对脱贫攻坚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对群众反映的“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敢于直面，响鼓重锤，较真碰硬，做党委和政府的“诤友”。真正将监督的过程变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政策落实、工作落地的过程，变成解决问题的起点。

(五)凝聚党派思想共识，加强党派自身建设

开展脱贫攻坚这类专项民主监督，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都是首次，没有经验可循。对各民主党派团队的综合素质来说，这是一次检验和挑战，既可提高队伍的能力，又能发现队伍存在的问题。各民主党派要利用和把握好这一难得的契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四个建设”和“提高五种能力”的要求^[1]，不断强化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双向发力，内外兼修，真正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建设和发展自己，为实现中国梦贡献独特智慧。

(六)发挥参政议政职能，利用好人民政协制度平台

民主党派应始终坚持定位要清、目标要明、担当要强、对策要当的参政议政原则，通过规划先行、特色取胜、人才为本、整体运作四个方面，不断

提高公共决策的专题化、专家化、专业化水平。整合党派内部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围绕政党协商主题和重大发展课题，集中力量、尽锐出战，搞好深度调研，集思广益形成党派共识，提高协商质量和参政议政水平。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职能中，形成“指向精准”的意见建议，并且围绕自身优势，精准提供社会服务。充分利用人民政协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通过专题报告、专题议政发言、参加重要调研活动、提交提案等形式，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参与率和调研成果的转化率。

(七)强化专题调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把“围绕大局，服务中心”作为民主党派的一个常态化议题，准确对接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精心谋划、精准设计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调研专题。确定调研专题，一是选题数量要精不要多，把重点选题抓深抓细抓实，努力提高民主党派议政实效和建言献策水平；二是选题要有超前意识，注意发现和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解决而当前尚未解决的前瞻性问题，选择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抓住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课题，组织力量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可操作的调研成果，为党委政府推动工作提供科学、可信的决策依据和智力支持。

(八)整合资源优势，发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作用

在脱贫攻坚战中，各民主党派既是监督者，更是参与者。民主党派具有智力密集、人才济济、联系广泛、渠道畅通、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成员广泛分布于文化、教育、经济、医疗卫生、科技、法律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在脱贫攻坚中都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民主党派要针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最期盼的发展需求，选取熟悉领域，充分调动成员积极性，科学整合党派优势资源，在农村技术人才培训、医疗卫生人员培训、

农村教师培训、职业教育培训、产业技术人才培训以及“互联网+”、经济信息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把人才智力资源优势用好用活用实。

总之，各民主党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优良传统，不忘合作初心，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把党外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2020-01-15).
http://cppcc.china.com.cn/2020-01/15/content_75614910.htm.
- [2] 习近平的人民观[EB/OL].(2016-12-26).
<http://news.cri.cn/20161226/bfd7474f-1a18-7492-c891-9db34f275d1e.html>.
- [3] 学习总书记在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 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EB/OL].(2015-05-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27833414.htm.
- [4] 习近平强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 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EB/OL].(2019-03-08).
http://tuopin.ce.cn/zg/201903/08/t20190308_31639568.shtml.
- [5] 南方时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EB/OL].(2016-04-29).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429/c1003-28314066.html>.
- [6] 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EB/OL].(2015-12-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1/c_128491293.htm.
- [7] 为脱贫攻坚之役注入民主监督之力 [EB/OL].(2016-08-1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6/c_129233876.htm.
- [8] 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EB/OL].(2017-10-10).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0/content_41707147.htm
- [9] 甘肃统一战线脱贫攻坚再加力[EB/OL].(2017-05-09).
<http://www.rmxzbx.com.cn/c/2017-05-09/1526625.shtml>.
- [10] 习近平教我们如何“绣花”[EB/OL].(2017-04-14).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4/14/c_136208137.htm.
- [11] 民民主党派要提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EB/OL].(2015-07-04).
http://cppcc.china.com.cn/2015-07/04/content_35980323.htm.

责任编辑：宋好

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课题组

摘要:深入分析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着重揭示近几年来我国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和启示:拥有巨大成长机遇和全新增长点;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双向特长;充分发挥基建承包和运营优势;投资和贸易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坚持本土化生产经营实现全局性和高质量“走进去”;配合国有企业发挥战略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主体重要作用;发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提升消费水平和内需市场“全球化”水平;资金支持体系趋于健全。同时,深入剖析了“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危机风险和主要问题,对民企参与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七个方面 24 条务实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企业;“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50-15

近几年,“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至 2019 年上半年,中国与美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14%,低至 2583 亿美元,居欧盟、东盟之后。数据显示,贸易摩擦前美国对中国出口支持美国超过 100 万个就业岗位,2019 年前 9 个月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下降了 15%,约 788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则自 2016 年峰值以来下降 90%。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幅度分别高达 36.45% 和 83.45%。2019 年上半年,中国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9.6 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20%,一些中国企业被迫退离美国市场。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互惠互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

收稿日期:2020-04-28

作者简介:课题组顾问:许仲梓,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顾万峰,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课题组组长:刘志彪,全国政协十二届委员,我国经济学首批长江学者、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课题组副组长:杨剑,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召集人。课题组成员:浦文昌,全国工商联智库专家,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刘奇洪,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申斯春,江苏省委研究室调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尤展,《群众》杂志总编办主任、副编审,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课题报告执笔:吴跃农,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省工商联一级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

是党中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4%，超过美国。近6年来，中国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额达到8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1%。2019年希腊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新成员，中东欧“16+1合作”升级为“17+1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东盟、非洲、美洲的贸易额更是稳步增长。安永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893.3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新时代的国内发展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发展是整体性的，在建设发展强大“本土中国”基础之上，建设发展“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本土中国”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相互支撑和促进，构建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各国普遍承认“没有中国的资本，类似工程永远不会完成”（指民营企业参与投资承建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世界最长海底铁路隧道）。基础交通便利性、各国生产的关联性、互相性，伴随着“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进程提速发展，沿线国家人民生活必会越来越依赖中国主导新全球产业链所提供的创新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至2019年，民企参与的“一带一路”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民营企业活力迸发，企业家精神昂扬，参与的对外投资、贸易主动性、积极性、渗透性强劲。在提升自身的相对规模、实力和竞争力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拉动作用明显，激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

贸易联系愈发紧密。由此，“一带一路”内部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至2017年已达13.4%，其体量已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创造了巨大投资和资本需求。

一、民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10个方面成效

（一）拥有巨大成长机遇和全新增长点

1.“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不是传统经贸关系

“一带一路”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发展差距和不平衡，但有着发展互补性、协同性，孕育着巨大发展潜力。中国与沿线国家有一定投资—资源互补性。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2803亿立方米，需求量还在持续增长。俄罗斯东线输气管道全部竣工，每年输送380亿立方米，占中国消费总量的14%。这不只是一种资源贸易互惠关系，更是一种深刻的发展规划对接、协力共建的长久共进关系。这种关系促使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腾越空间，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和创新导向可以并重，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经济共享发展和全新增长空间。

2.“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是“价值链增值”的全新增长点

沿线国家水利电力交通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中东战后国家重建以及巨大的制造业本土化空间，使得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产能扩张转移有充分可能性和合理性。建造高速铁路、工业园区，在经济特区、深海港口等开展更多合作，是民企在内的中国基建企业、制造企业、能源装备企业、港口运营管理企业等重大的长久战略机遇，是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产业链集成优势”和“价值链增值”并举的全新增长点。

（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双向创新特长

1.“双向挤压”下坚持双向创新

中国产业在国际上处于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新兴经济体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必须直面技术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向上与向下两个方向创新并重。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突破发达国家技

术垄断与封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GVC)的位置，勇于与发达国家竞争高新技术领域制导权、产业链主导权；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向下包容性创新，以中国资本和制造业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一带一路”市场需求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我国产业发展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和一定差序化是必然的，高质量发展本义就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和包容性不足的问题。

2. 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外经贸极强抗险性

即使在 2020 年 1—3 月全球疫情蔓延开来的情况下，2020 年 3 月份中国海关的数据是，出口仅下降 -3.5%，进口逆势增长 2.4%，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出口降幅较小、比重提升。2020 年一季度，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2.78 万亿元，下降 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2.4%，比去年同期提升 1.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71 万亿元，下降 7.3%，占出口总值的 51.4%；进口 1.07 万亿元，增长 7.9%，占进口总值的 33.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6 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39.6%。国有企业进出口 1.16 万亿元，占 17.7%，民企自 2018 年以来，稳居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2020 年前 3 月，疫情情况下进口主要是铁矿砂、原油、煤等大宗商品和肉类等重点民生消费品较快增加，预示了民企疫后复工复产强劲的生产爆发力，显示出以民营企业为绝对主力的中国商贸极强的抗险性和增长韧性。

3. 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外经贸坚持双向性

“一带一路”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是中国产品、装备及产业“走出去”的巨大机遇。中国全球商贸坚持上下双向性：输出商品“有轻有重”，技术含量“有低有高”，有发端于浙江义乌遍布海内外的民营商贸市场的打火机、纽扣、服装鞋帽、玩具、雨伞、梳子、圣诞节用品等低附加值日用品、轻工纺织品，更有民营科技巨头华为、小米、联想、大疆和比亚迪公司等的智能手机、5G 基站、电脑、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太阳能、风能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国有企业的卫星、高铁、核电、远洋巨轮、军械等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型机械设备。中国民企、国企参与国际分工“有

浅有深”，有单纯的商品出口，更有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输出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共建合作主导的全方位“办世界工厂”“办世界市场”。

(三) 充分发挥基建承包和运营优势

1.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布局全球新的港口建设和运营管理

民企参与的中国企业建造的世界最长 90 公里的爱沙尼亚至芬兰海底铁路隧道，为冰上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总融资 150 亿欧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发展改善港口设施有迫切需求，民企为国企配套，中国港口企业有卓越的港口建设和运营服务能力。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参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卡塔尔多哈新港、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等等 34 个国家 42 个港口工程的建设经营，提供港口一体化解决方案，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家，同时开通了自连云港经俄罗斯至北欧的北极航道冰上丝绸之路。

2. 做强互联互通“地理收缩效应”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共建是基石。“六廊六圈”为主的互联互通基础建设，陆上丝绸之路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全新开拓的北极航道冰上丝绸之路的境外部分皆是薄弱部分，依然是一个开拓建设概念。民营企业配合国有企业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高质量运营，推进“一带一路”陆上、海上、空中、网上互联互通，做强“地理收缩效应”。这为“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节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进一步实现全球联动发展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自由贸易，塑造全球经济崭新的增长点。

3. 建筑承包、装备制造业是强项

2010 年以来，民企在内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年均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达到 70 万个；中国金融机构为国际基础设施合作提供融资超过 3000 亿美元。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达到 2.3 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达到 1.6 万亿美元，地域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涉及交通运输能

源电力工业与民用建筑石化通讯等领域，业务覆盖设计咨询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69家中国企业位居全球最大250家国际工程承包商之列，整体市场份额达到了24%，居全球第一位。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252亿美元，与2018年同期基本持平，2019年较去年同期增长4.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3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506亿美元，同比增长13.5%。包括民企在内的我国企业装备制造能力强，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较高，有能力也有条件与各国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与基础建设投资承包相伴随，一些民企(如湖南的三一重工)的装备是技术、服务、标准“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对于提高中国制造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装备制造业在设计能力、工艺水平等方面具备雄厚实力，很多领域处于世界顶尖行列，具备拓展“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坚实基础。

(四)投资和贸易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1.开展全球性的新“农村包围城市”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覆盖的一些非洲区域有许多地方确实经济不发达，还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然而，这恰是世界范围内新的“农村包围城市”促进全球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进程，有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具战略整体规划性，有利于走一条“一带一路”经济上“共在”的共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更大范围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宽广道路。我国民企与国企携手共进，将长期规划和近期市场目标相结合，能够对跨国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施工，来建立横跨欧亚大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更具影响力和更宽广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西方不会有如此持久深入整体性的参与度，因为这些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对投资国经济增长产生作用。2019年全国工商联对近千户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民营企业进行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半数民企(50.9%)处于盈利状态，其中当年即实现盈利的19.1%，3年内实现盈

利的27.7%。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总量增长率持续下行，2020年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严重冲击和影响，全年增长率可能仅为4%上下。但这一定是暂时的，是新蓄力过程，增长潜力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潜伏，克服当下国内新冠疫情阻挠后，在全球疫情得到缓解、全球市场重新启动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U形回升。因为根据数据分析，至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承包营收及进出口额三项增长率平均值为10%以上。同样根据全国工商联2019年的最新抽样调查，参与“一带一路”的民企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利润空间较大，仅有16.8%的一般制造业和20.3%的服务业企业利润率低于10%，这两类企业有35%的企业利润在40%~50%之间。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与外部资源有机互动与结合，促进中国产业链与亚欧对接融合，就能在广泛强大动力下回升并持续增长。

2.以民企新能源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有承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能力

中国制造业占据全球产业链的80%~90%，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发挥好制造优势，不只是转化为财富，更是筑牢中国与世界坚硬不拆的关系。令人欣喜的是，民营企业64%的投资都进入了可再生能源新制造业领域，如我国全球风能和太阳能渗透率近年迅速提高，装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相关的设备制造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又如以江苏省协鑫集团、天合光能公司等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光伏产业是我国面向海外的重要新兴绿色制造业，产业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组件产量连续12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出口至186个国家和地区，组件出口额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1.89%，出口量16.78吉瓦，同比增长77.63%。

3.以民企为主体的中国投资贸易构建全球价值链

全球70%的贸易都涉及全球价值链。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投资贸易，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全球投资贸易是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

资本鲜明特色,至 2019 年初,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已经超过 900 亿美元,为很多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融资。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 341 起,分布在全球 49 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 962 亿美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年度贸易额超过 8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逾 100 亿美元,与俄罗斯双边贸易额 2018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中东欧国家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的支点之一。2019 年,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在 30 万亿元规模,外贸结构优化,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于整体,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长 20%。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 29.3%,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 58.4%,企业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 51.4%,成为我国出口第一主体。过去 10 年,中国在欧洲并购投资至少 3180 亿美元的资产。江苏民企其元集团 2007 年率先在非洲建立后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江苏民企红豆集团 2008 年建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区及红豆工业园。至 2019 年,包括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在非洲在建或运转 100 个工业园,40% 投入运营,配合国企建成 5756 公里铁路、4335 公里公路、9 个港口、14 个机场、34 个中型电站、10 多个大型水电站和上千个小型水电站。2017 年,我国共对全球 1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36 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1200.8 亿美元。至 2019 年,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2019 年前 11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2 万亿元,增长 10.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2.5%,比 2018 年同期提升 3.1 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其中,出口 8 万亿元,增长 12.4%,占出口总值的 51.4%;进口 4.12 万亿元,增长 6.5%,占进口总值的 31.8%。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8.35 万亿元,增长 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7.5 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 29.3%,比重提升 2 个百分点。

4. 民营新经济是创建“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价

值链的生力军

以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为代表的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新商业模式加速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智造链以及资金链全球化,加速我国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有最大金融科技创新市场,阿里巴巴、腾讯的数字支付规模是美国的 50 倍。阿里巴巴跨境及国际消费业务在 2017 财年实现强劲增长,速卖通、Lazada 平台的海外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 8300 万,接近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人口总和,阿里云在海外市场规模增速超过 400%。作为阿里旗下面向全球市场的 B2C 电商平台,速卖通已覆盖全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单个企业经营的规模、实力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快速成长和“互联网+”,民营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商贸生态把海内外企业抱成一团,率先实现了天下企业的跨国无界和同在地球村。

(五)坚持所在国本土化生产经营,实现全局性、高质量“走进去”

1. 民营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化生产经营,走高质量全球化之路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优质产品、贴心服务和本土化生产营销服务网络,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走进海外的更深、更广市场的根本原因。浙江民企吉利控股集团实现从单一汽车产品贸易的“走出去”到深度参与当地工业化的“走进去”转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来西亚、英国、瑞士、比利时和白俄罗斯均有本土化生产经营,促进提高当地生活条件、增进文化交流和民间交融,实现吉利控股集团全球化战略布局。至 2019 年,浙江民企正泰集团与 80% 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不同程度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覆盖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北美、欧洲、亚太三大海外研发中心、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 家国际子公司、22 个国际物流中心,走出了一条“产品走出去、服务走进去、技术走上去”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全球化之路。

2. 民营企业走向全球通过本土化建立牢固“根

据地”

民营企业在当地站稳脚跟、生根发芽，“本土化”经营是建立海外“根据地”的重要法宝。民营企业有灵活的用人机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民营企业处于“一带一路”最前沿，企业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实情参与做出企业重要决策，甚至可以“先斩后报”，民营企业用人机制契合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雇用当地员工为主，使企业在世界各地都能有效承担工作职能，逐步实现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和服务全面国际化。许多民营企业坚持所在国本土化经营，实行就地化管理，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与当地法律风俗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同时坚持输出先进产能，发展现代产业，市场建设注重与本土营销网络保持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当地拓展贸易链、产业链、供应链等。

3.所在国本土化具有双向促进作用

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通过本土化的生产经营、深入布局和区域辐射作用，既促进高效产出更加贴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品当地营销，覆盖本地市场，又通过立足当地辐射全球市场；同时又促进企业做强，促进企业产业链在国内与境外的一体化做强。如民营企业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图拉当地化生产，成为长城汽车打通欧洲市场的重要支点，也是长城汽车走向西欧乃至全球的重要出发点。

4.所在国本土化生产筑牢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基础

民营企业本土化经营的重要内容是与已经在当地成功拓展的海外企业、海外机构建立第三方“强强联合”新型合作模式，筑厚、辐射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合作基础。如湖南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在国际上选择与印度阿达尼集团等优质企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联合工作组，在印度等国联合开发业务，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三一重工还通过投资项目运作、实施和管理与中非发展基金携手共进，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南非等5国与各国先进工业制造、清洁能源电力、大型基础设施、现代筑工的大

型企业抱团合作。

5.民营行业龙头企业掌控全产业链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承载能力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闭环，如世界500强的江苏民营企业恒力集团，通过与中东产油国及新加坡的商贸企业以及我国中石油的深度合作，完成从石油原材料到化纤产品生产、石油产品生产及供应的全产业链掌控。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正在开拓创造“建工厂”与“建市场”相结合，产能输出与模式输出相结合，境外园区建设与物流基地建设相结合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六)民企配合国有企业发挥战略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主体性重要作用

1.配合国有企业发挥好“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主体性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是外向型经济主力军，民营经济占外向型经济的出口份额尽管已经上升为首位，但对外投资及重大工程的承建、长期性商贸布局以及对海外资源的控制性，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还有较大差距。鼓励民营企业配合国有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继续配合国有企业发挥好全球市场竞争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大型建筑、投资领域的领导力提升，提高置身全球市场经济的生存赢利水平。如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其旗下公司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资产超过700亿美元，并正在收购俄罗斯黑海一码头。国有企业在南亚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有着较强存在感。在马尔代夫，国有企业为20多项工程提供贷款，仅其中规模最大的三项工程的价值就接近马尔代夫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冶集团在越南设计建成了东南亚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台塑越南河静钢厂1号高炉，实现中国特大型高炉核心技术和装备整体出口；国家能源集团在南非参与的德阿风电项目高标准投产，实现全产业链“走出去”，被誉为金砖国家能源合作典范；2017年，民企配套的中国建筑在9个新国别实质运营，经营布局持续完善，在20个新国

别进驻设点，市场触角大幅拓展。

2. 配合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力量、意志和战略意图布局海外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实力上升，奋力扩充能源和原材料领域资产。特别是加强对境外的能源控制，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创造和谐世界的主力军。市场经济不只是市场，市场后面一定有国家战略意图驱动和支撑，控制市场，增强国家话语权，向来是与市场经济相随伴生的。国有企业发挥关键作用是在国际市场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民企则更积极配合相关工程，并将这种优势打造成标准优势，向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民营企业有更深入所在国市场的优势，充分发挥与国有企业联手打造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的作用，做到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和技术、标准、装备一体化，实现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的运作。

（七）承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和地方政府动力，形成发展倍数效应

1. 把握好国家关系中区域关键国家和节点，率先推进新基建

民营企业善于承接把握发挥好国家战略引领作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形成发展倍数效应。如巴拿马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经济主要依赖运河航运、自贸区、旅游等服务业。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也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最大商品供应国，巴拿马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巴拿马成为民企为主力的中国商品迅速进入拉美区域的重要门户，成为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区域性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民营企业积极跟随国有企业采取的“双聚战略”，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聚焦重点产品，把握好新区域和新增长点。又如中阿关系中，2018年7月，中阿双方达成并签署《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沙特的“2030愿景”，约旦的“2025愿景”等不少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发展规划的对接为阿中企

业长远合作打下坚实基础，民企由此从传统商贸、投资到数字经济全方位拓展，并使中东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先推进数字经济新基建的示范区。

2. 善于成为省区市地方政府与沿线国家地方政府紧密合作项目的承接者

地方政府是具体执行引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高速发展与地方政府竞争大有作为紧密相关，地方政府竞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引领力。国家战略引领，地方政府搭台，民营企业承接项目，强化把握机遇，双方充分市场化运作确保沿线国家有利可图。中外地方政府合作是“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营商环境优化的主导力。随着地方合作提速和合力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如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俄罗斯实施国家振兴计划和地区发展战略，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两国发展战略交汇点承接项目。如长江6省市众多民营企业在伏尔加河畔投资兴业，江西省民企投资的彼尔姆木材加工厂投产，成为两地区首个落地的重要投资项目；重庆市民企投资的鞑靼斯坦共和国玻璃纤维生产线，安徽省民企投资的乌里扬诺夫斯克水泥厂，特别对长江经济带中部内陆省区，有着加速“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功用。

（八）提升消费水平和内需市场“全球化”水平，打造经济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消费链和全球化供应链

1. 民营企业践行内需全球化的新动力新方向

内需市场很大部分是装备、设备，是中国全球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2017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为9431.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中间品进口额的36.3%，其比重较2013年上升5.0个百分点。其中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3023.1亿美元，占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的32.1%。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极大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2018年，中国进口额与美国相比仅差4820亿美元，在世界进口额占比达10.75%。2013年至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是“双向”的，需要中

国投资、技术、建造,也需要中国市场开放。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至2017年,中国贡献约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76.2%,比2017年提高18.6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个百分点,以民企商贸和服务业为主体的内需消费连续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1%,据推算,至2030年,中国消费额将达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西欧的总和。中国有互相叠加的规模效应与制度优势,有民营企业为骨干的汪洋大海般的消费品供给侧商贸企业、各类专业市场及门类齐全的服务业,与14亿消费人口共同构成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和消费增长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对外商贸,联结的是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中亚、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庞大的年轻人口,他们既是劳动生产力,又是强劲的消费力。内需市场全球化与中国引领全球市场是一个方向、一个平面。

2. 民营电商企业线上引领全球消费新模式

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超34亿,全球渗透率达到46%,中国民营电商企业从起先进口为主的“全球买”,迅速将内需市场拓展为“全球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付、全球游”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崭新模式,并使“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转型,成为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核心力量,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更强的价值链。内需市场打通城乡间隔的广泛深入和外向市场无远弗届的凌厉拓展融合一体,构建全球线上消费市场,天上地上全速物流,24小时货通全国,72小时货通全球,带动中国企业家出海,吸引全球商贸企业集聚。

3. 消费超过经济行为本身,具有国家强大存在力量和效应

经济结构优化是新增长极,相较于投资、出口,消费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黏性。2013年至2018年,民企消费占额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主力。

我国进口规模从1.95万亿美元增加到2.14万亿美元,累计增长9.5%,是同期全球进口增幅的2倍,占全球进口比重从10.3%提高到10.8%。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计算,2018年,中国以外国家年度出口额比2013年平均增长2%,其中中国进口增加让这些国家出口净增了大约1800亿美元,对同期全球(不含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全球贸易伙伴从中国进口增长中获得了出口增长的巨大收益。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14年至2018年,中国从133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增长;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前2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进口平均增长14.1%,高出出口增幅8.3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8%。同期贸易平衡指数由8.9%下降到7.6%,其中和2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指数均值由15.1%下降到11.4%。民营企业对外经贸的贡献超过经济数字本身,成为国家力量的重要贡献者。因为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其涵纳的市场容量之大,其溢出效应一是全球贸易定价者,二是握有丰富外汇者,促进人民币本身成为世界硬通货。如以民企为主力的旅游业,既促进内需消费,又促进国际市场内需化。21世纪初,我国出境游人口仅为1000万人次,消费仅100亿美元,至2018年,民企为主的旅游业构成的我国出境旅游人数高达1.62亿人次,比2013年增长65%,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消费支出达到2770亿美元新高。形成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市场强虹吸凝聚效应,中国消费者与中国商品抵达世界各地,全球的天然气、石油及资金以最快速度和最低成本流入中国,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结构。

(九)资金支持体系趋于健全,融资市场化、多元化

1. 加强金融合作

有民企为主力的强大制造业和商贸业基础,才有我国与东盟、欧盟、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深入加强的金融合作,我国通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充分吸纳民间资本,构建中

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框架等,鼓励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一带一路”项目巨大的融资需求对全球资金供给者是难得的合作机会,包括投行、基金、多边金融机构、出口信贷保险机构(ECA)、保险等。花旗集团跟中国几家大银行签署了“一带一路”专门协议,德意志银行和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整合沿线金融资源和金融科技经验。

2. 加速金融布局和融资支持

截至 2018 年底,11 家中资银行在 28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 76 家一级机构,来自 22 个沿线国家的近 50 家银行在华展业。金融服务涵盖信贷、担保、债券承销、并购重组、风险管理、支付清算等领域。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 4400 亿美元。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超过 3200 亿元,中国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超过 5000 亿元,沿线国家和企业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超过 650 亿元。至 2018 年 6 月,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29 家分支机构。支持“走出去”项目 393 个,累计承贷金额约 1028 亿美元,2018 年上半年新承贷“一带一路”项目 50 个,承贷金额 110 亿美元。

(十) 稳步推进民营企业参与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结算体系

1. “一带一路”投资—资源关系等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支撑

市场经济贸易方式获取资源依然是我国重要战略性目标,中国企业布局全球锂矿市场,控制了全球近一半的锂资源开采和约 60% 的锂电池产能,而伊拉克每天 10 万桶原油换中国投资重建持续 20 年是最新案例。原材料、燃料等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普遍改用人民币支付的正是资源开采国。2017 年“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 61.0%。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中

国积极主导作用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物流链、价值链,实现与沿线国家联动发展。

2. 民营企业收购海外银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和释放金融能量

民营企业在一些非洲国家经营银行已经较成规模,包括在欧洲国家如黑山共和国已经控股国家银行,民营企业海外银行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内企业和所在国人民,这样的经济发展实践不仅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更是对国内的改革深入有积极作用。

3.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成为储备和结算货币

2019 年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接近 20 万亿元,是 2009 年的 5000 多倍。俄罗斯在努力去美元化,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从 2018 年的 5% 增至 2019 年 3 月的 14.2%。2020 年 4 月,欧洲银行将价值五亿欧元的外汇储备从美元转成了人民币。2018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直接投资显著增加,推动 RII 达到历史新高 4.91%,一度超过英镑和日元,位列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2018 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RII 达 2.95%。相比 2009 年我国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0.02% 的数值,至 2019 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攀升至 304 点,跃升近 150 倍,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24%。越来越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逐步改用人民币结算并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我国在 7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中国银行发挥全球化人民币主力清算行优势,在东盟 10 国都已建立机构,在新加坡搭建了多个区域业务中心,马尼拉分行发起成立了由 14 家当地银行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至 2019 年 3 月,有俄罗斯、委内瑞拉、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 28 个国家采用人民币结算。

4. 人民币结算 CIPS 系统国际化进展良好

2015 年 10 月启动以来,已经有 89 个国家和地区 865 家银行接入 CIPS 系统。日本有 30 家包括三菱(UFJ)和瑞穗两家大型银行、21 家地方性银

行和 7 家外资银行接入。2018 年 12 月莫斯科信贷银行接入 CIPS,23 家俄罗斯金融机构接入,俄罗斯美元占比从 46% 降为 23%。非洲接入达 31 家。2018 年人民币结算系统交易额增长八成,超过 26 万亿人民币,CIPS 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拥有美元以外的结算手段。中国银联在“一带一路”沿线 106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业务,累计发行超过 4300 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逾 1200 万家商户和 80 万台 ATM,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超过 25 倍、8 倍、3 倍。银联移动支付服务在 31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转接网络是以银联技术和标准建设而成,中国银联还向亚洲支付联盟、缅甸支付联盟等授权芯片卡标准。移动数字支付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支付宝在英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9 国和地区落地,已与 250 多个金融机构合作,腾讯公司的微信跨境支付有超过 49 个境外和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网联平台运用分布式架构开发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重要里程碑,网联提升了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

二、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危机风险和主要问题

“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有来自外部政治干扰危机,也有自身素质欠缺,主要有:

(一)全球供应链恶意截断危机

美国“脱钩”战略的重要战术是打技术战。长期以来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并没有换来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反而使企业、行业发展始终受制于人,受到“纵向压榨”“横向挤压”。2018 年中兴通讯事件等凸显我国产业“缺芯少魂”现象,而 2020 年 4 月美国在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重、国内无以应对疫情乱成一团之时,依然不放弃推行中美“脱钩”战略——凡超过美国技术 10% 的高端配套芯片企业都不得向华为供应半导体材料,对华为实施彻底断供,美国单边主义“断供、脱钩”施压,政治压迫性危机频频恶袭。美国企图破坏跨国高效供应链,迫使企业接受效率更低的制造体系,目的是让中国生产率增长乏力,裂断产业链,阻止中国经济

增长和科技进步。

(二)西方戒备使并购投资受阻

欧洲是重要投资对象和市场,中国投资者花费几十亿欧元收购很多德国企业,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但西方在“中国威胁论”片面化、夸张化渲染下,德国为此拉响警报,法律门槛提高,一些并购业务无法完成。中国在德收购科技企业受排斥,2019 年上半年中国在德国直接投资仅 5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 101 亿美元。2019 年第三季度德国陷入衰退,环比增长仅 0.1%,欧盟 2019 年增长 1.1%。对中国的创新围堵和发展戒备,日本新增 20 多个领域限制外商投资,涵盖计算机制造、半导体存储器、软件开发、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等 20 个领域,武器制造、核电等特定行业列为外商投资限制对象,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限制出口,扩大至最新技术领域。随着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西方国家更会以卫生防疫理由阻止中国投资和产业链联结。

(三)政治和文化环境风险

中国企业对风俗人情了解掌握不透,面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宗教民族、文化习俗差异较大,有的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宗教冲突频发,中国企业在全新营商环境中谋发展,需要下大力对所在国法律法规熟悉掌握,稍有文化习俗上的差错就会产生对立情绪以及劳资对抗。

(四)“现代供应链”等领域急需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供应链服务体系是我国服务业非常明显的短板,我国每年有价值 250 多万亿的货物在流动,因为物流供应链体系还没有很好协同起来,造成极大生产性物流浪费,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如果降低 1 个百分点,能够给国家带来万亿级的新增效益。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只占 GDP 的 15%~20%,还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一半,大量制造业企业还处于传统经营状态,这背后是供应链服务体系的缺失。

(五)国有企业是“走出去”主力军,投资亏损

面有待减缩

国有企业“走出去”投资产出整体效益还有待提升，亏损有待减缩，尤其只接触当地小政府而忽视当地大社会，仓促上阵陷入被动被困，国有企业不是单独经营，其亏损会连带配套的中下游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至 2018 年初，中资企业投资海外盈利和持平的为 70%，有近 30% 境外中资是亏损的。

(六)“一带一路”投资竞争激烈，各种干扰会更多，资金缺口仍大

中国有一定的基建优势，但并没有投资独家垄断性，在南欧最为友好的塞尔维亚，中国投资也仅与美国持平，在东南亚，日本基建投资额高出我国三分之二。根据近年来主要国际机构预测，未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供需缺口每年均处于约 1 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水平。根据 2020 年疫情前的预测，到 2040 年，全球基建项目投资需求将增至 94 万亿美元，而全球各类基建投资缺口总额将达 15 万亿美元，相当于基建投资总需求的 16%。

(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待提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到近 62%，欧元排第二占 20.2%，中国尽管已经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仅占 2% 多，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初步匡算值仅为 3.20%。2019 年 3 月，人民币在 SWIFT 的资金结算额排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后的第五，与中国经济总量不相称。

(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步伐应更大

不解决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能过剩问题，“一带一路”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加快推动民营装备业“走出去”，拓宽国际市场，是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九)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系列问题

对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千军万马来说，既是发展良机，也是更大挑战，既有源于内部在同一区域相互压价自相残杀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象，也有“政策掌握难、境外项目融资难、境外建设资本和利润进出难、项目运作不

规范、国际化经营和管理人才匮乏、投资合作管控偏紧”等系列操作性问题。

三、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一)坚持“双强”驱动，确保我国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1. 坚定不移“双强驱动”

尤其“强政府”是优越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经济发展强驱动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充沛热情和竞争性，具备建设管理现代化的能力和管理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强政府和强市场的主体双方，都要一以贯之坚持“双强驱动”，决不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蛊惑干扰，决不自疑动摇，自乱阵脚。

2. 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引导作用

既要与沿线国家政府协议，也要与当地社会组织协商合作，积极引导各类企业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确保“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快速有序。

3. 加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管理并认真解决其效率问题

发挥好国有企业集团军作用，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强国民共进，从责任权利机制和企业家精神释放的根本问题入手解决，对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和监管，促进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正面积极作用，带动、携手民营企业正向发展。

(二)用创新和投资阻止全球供应链断裂危机

1. 要采取新举国体制和市场主体研发相结合大力推进创新

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和基础性科学的研究，要靠国家力量承担及发挥好中科院下属研究所 5 个卓越创新中心、在非洲、中亚、南美、南亚和东南亚建立的 9 个研究和培训中心的骨干作用，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要靠市场主体，要靠民营企业的产学研研发主体性作用。2019 年，中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专利国，其中华为又是企业界世界专利第一，民营企业成为创新专利的主力。要把直接进行资源分配和对市场发掘、引导、激励结合起来，瞄准产业集群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集中力量攻克重点优势产业技术瓶颈和关键技术难题，从而提升产业集群总体的创新能力。要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建设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所需的质量体制框架；增强先进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增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增强整机和系统集成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有效管理和防止产业同质化竞争，解决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加快解决我国产业链由来已久，受制于人的“心脏病”（航空发动机等动力机械制造）和“神经病”（半导体芯片制造）。

2.以构建全球产业链为目标，引领和嵌入分工协作链，构建更具紧密度的协同发展产业链

以更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增强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注重集群内部各种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促进新型产业创新的全程化、一站式、全方位服务体系。坚定“合作共建互利共赢”，坚定投资，同时楔进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不气馁不松懈，依然以欧美日韩作为出口重要市场，如民营企业亨通集团总结的，“不深入进去，就不能共同成长”，促进中国庞大产业链整合全球要素，在技术可转移程度最高的行业中，为中国迅速扩张生产能力找到足够大的市场，以不可分割的产业链与欧美相关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同步水平提升并超越之。

3.加快构建供应链智能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战略机制灵活、市场反应敏捷的民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民营企业领衔创建国家智能物流骨干网。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把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起来，减少大量重复无效流动，让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更加有序和高效。通过区块链技术大力发

展面向“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交通和物流跨越区域发展的“地理收缩效应”，把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降到5%以下，通过智能、协同服务体系为制造业创造利润空间，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巨大动能，提升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美国的关税、断供、破坏产业链完整性等封堵行为，会一定程度上逼迫中国寻找替代产品、创新自建。但创新不能狭隘化关门独斗，技术创新是国家财富源泉，还是必须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宽广区域的开放、合作、共享中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激发实现创新提升，不同国家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各异，通过更好地主导构建价值链整合国际间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形成强大国际创新合力。发挥好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数字“一带一路”的创新模式作用和广泛渗透性、互相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企业融入当地立足做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研发创新作用。

（三）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解决中国企业收购困境

1.排除各种干扰，实施“点线面体”推进路径，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及制造业投资、运营输出和共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合力共进，双向创新。一是“点”上示范引领。聚焦全国具有战略性、基础性行业中龙头基建及制造企业，推动其面向“一带一路”全面布局。二是“线”上产业链融合。聚焦航空航天、海工装备、电气装备、电子信息、钢铁行业、汽车行业、生物医疗、新兴产业等典型行业，以产业链为枢纽，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一带一路”两端延伸。三是“面”上聚集融合。推动工业园区、开发区、境外工业园向“制造+服务”综合园区转型升级。四是“体”上构建产业生态体系。重点构建以国内和“一带一路”城市群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协同发展体系，打造跨行业、跨专业、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以更高质量、更优质服务、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全力扩张、构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

中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凝聚力、统一性和不可割裂性。

2.解决中国企业收购困境,建立国家对等并购清单制度

发布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白皮书和中国进口白皮书。如到 2018 年,德国在华总投资已超过 800 亿欧元,大众汽车近一半营收在中国,中国在德总投资仅 110 亿欧元,占其在华总投资八分之一略多。2018 年,中德贸易额已达近 2000 亿欧元,约 150 万中国游客到访德国,每周有约 100 个直航航班连接两国。这些都要积极宣传,扭转欧洲等国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吃亏论”等,逐步消除其戒备心理。

(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实行可控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1.促进“铺天盖地”的民营中小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走出去”

国内生产要素资源稀缺,现有传统制造业存量很大、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饱和、容量有限,要实现大规模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将国内产能优势通过“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既实现国内资源腾笼换鸟,又促进“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沿线国家进步。

2.倡导、鼓励民营企业勇于开拓

继续通过自主搭建成熟的海外中国工业园区,以资本利用、国际产能合作、技术输出为手段,升级“走出去”模式,进一步布局全球,实行可控制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梯度转移和发展。通过产地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管理等方式深刻改变一些民营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外贸出口方式向全球“卖卖卖”的单一经营模式,改变民营中小企业单一的国内资源配置方式,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真正与全球价值链融为一体,给所在国家带来就业岗位、税收和产业链拉动,推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走深走实,增强民营中小企业与所在国家民间深度融合。

3.倡导竞合发展,减少行业内部特别是民营企

业恶争残杀

现代企业竞争不只是单点竞争,而是价值链上多点竞争,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服务等多个环节。必须通过海外中国商会和驻外使领馆商务处的协调,阻止同行业民营企业的残杀性恶性竞争,促进行业企业在各个环节的竞争中,认知各自的长处和短板,促进各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享对方优势、节省整体成本,锻造民营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和促进行业整体共进。

4.加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扫清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的四大障碍:要引导、推动装备制造企业整合相关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加大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支持,提升核心竞争力;对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涉及项目许可、事前备案等程序予以精简,提高办事效率。

5.加快要素市场开放

加快土地、能源、金融、债券、劳动力、人才、技术创新、数据资源等要素市场的开放整合,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全球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是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抵御美欧技术封锁,为中国装备“走出去”高质量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民营企业是参与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的生力军,要坚持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层面的统筹,形成央企带头、民企跟进的立体化国际合作,深耕全球市场。

(五)加强金融合作,完善资金支持体系

1.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

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深化改革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结合，推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迅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区域一体化之中。

2.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原则相结合，解决投资资金缺口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力度搭建人民币双向投资商务平台；团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各参与方形成合力，通过合作加快形成信息透明、规则完备、公平竞争、政企协同的市场机制，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如，中国银行加大批次推出“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包含多种计价货币，募集资金；又如中国工商银行加大全球网点建设，加大力度支持“走出去”；并要使民间资本有更多参与感、安全感、归属感和依靠感。一方面帮助其寻找与国际资本合作的机会，通过多双边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推广股权投资，开展 PPP、BOT 等多种合作共建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员长期资本及民间资本参与，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分享红利。

(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1.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点对点”本币结算

加固壮大 CIPS 系统，扩大所在国货币与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同时确保全球市场动荡中向交易提供顺畅金融服务，双方经营实体在商品、劳务及直接投资的结算及支付时，按国际通行做法以及两国外汇法规，使用所在国和中国货币交割清算。推动本币和其他货币的跨国结算，逐步深化在国家银行支付系统领域的合作，在双方法律框架内支持商业银行独立做出加入对方国家支付系统的决定。

2.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专业操作，加强风险管理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同时要收紧监管，要对本土金融市场采取可控适度的外资政策和保护措施，坚决维护经济主权。大中型商业银行要组建综合性金融集团，发挥集团优势，以中资企业“走出去”所涉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等为重要目标市场，加快银行海外机构网络覆盖，积极稳妥开展业务。银行业要积极参与人民币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发展，实现离岸人民币产品涵盖批发、零售、投行和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拓展活跃有序的人民币离岸资金交易市场，完善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机制。要加强风险管理，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综合经营的跨境、跨界、跨业风险，健全覆盖所有境外机构与业务的并表管理框架，加强与境外机构和业务有关的战略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国别风险等全面风险管理。

3.大力调整美元储备策略和降低美元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丰富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促进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可规避美元霸权以及毫不讲理的所谓“制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家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点带面，推进建立区域性、多方性人民币结算、本币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力度，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依赖。中国主导的第四轮全球化不能继续再受制于美元交易结算的任性盘剥及宽松稀释。

4.发挥数字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领先地位

中国央行具有得天独厚的监管能力，通过发行数字货币和运用数字支付手段，强化我国主导新商业模式及数字结算。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不可阻挡地推进，同时推广运用以民营企业阿里巴巴、腾讯为骨干的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新模式、新业态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新特质。

5.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

金融科技领域是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少数领域之一。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在跨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七)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

1.加强产业扶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拓展跨境产业链

要鼓励、引导企业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聚焦主业，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远期发展规划，制定民营企业切实可行、借力共赢的“走出去”发展战略，灵活运用绿地投资、并购参股等方式，在海外布局生产基地，建立营销供应网络；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进驻境外工业园区，多打组合拳，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尽可能地多打包，与合作对象深度整合、结成共商共建共赢共同体；要提高企业“走出去”的组织化程度，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国有企业实力雄厚、外资企业渠道广泛的特色优势，鼓励积极探索组建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境外投资实体；要强化政府引导和支持服务，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加快完善风险评估、防范和应急处置体制机制，切实维护“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权益。

2.创新金融服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

要强化金融制度安排的全面性和统筹性，应统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培育、金融服务提供和金融监管等各领域，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立体化布局，引导形成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等各业态错位发展、有序拓展、相互借力的网络化布局。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产品组合和专业化服

务，积极探索在境外园区开展“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试点，为企业境外投资合作提供以信贷为主体，投资租赁、贸易金融、信息咨询等业务为补充的多元化融资支持；要加快建立完善境外资产评估和交易体系，有效盘活企业境外资产，为广大民营企业提供切实、可操作的融资政策支持；要积极探索人民币和所在国的本币结算，有效规避美元霸权和被割韭菜，对本币结算给予金融资本进出的通关便利化。要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给予较详尽的针对性强的金融政策指导，可以参考工业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尽快出台企业境外投资利润流转回国的所得税免征政策，避免双重缴税，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3.加强全面服务,积极提供政策、法律、外事、保险和安保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

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时事变化，及时进行境外政治经济走势的解读，鼓励民营企业从各级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和措施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机遇点、国际化发展方向并及时避开风险点。要针对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及文化习俗的较多盲点，通过持续举办国际化发展涉及的经济、法律、财务、合同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题培训，提供商务谈判、国际税务、国际融资、跨境并购等实用型跨国经营人才培训、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实务型培训和普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和风俗人情常识培训。要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国际业务风险管控体系，紧抓全流程风险防控，制定国别风险综合管理方案，强化项目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管理。要强调国别法律风险识别、预警和防控，提高风险化解的主动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小语种的语言问题，组织相关大学或企业大学，进行针对性强的系统语言培训，为企业生产第一线及时输送应用型人才。

责任编辑：龚万达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突破方略研究

蔡云清 李碧珍

摘要: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民营经济仍面临着发展增速趋缓、投资意愿走低,企业家信心不足、创业创新动力不强,以及民间投资“造血还债”能力下降等现实困境。民营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需全面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民营企业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构建“亲企清政”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好思想引导,促使企业家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企业家精神和顽强生命力,全面推进民营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突破方略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65-07

一、问题的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近年来相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1]、“两个都是”^[2]、“三个平等”^[3]、“自己人”^[4]等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怎么看待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人士的积极参与,有利于汇聚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因此,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亲企助企”政策体系?如何以提质增效为突破口,提升民营经济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如何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拓宽民营经济投资的领域和空间,引导民营企业再创发展优势?如何弘扬企业家

精神,提振企业家创业干事的“精气神”?使民营经济更具活力,供给体系更好地契合消费者需要,让有效供给结构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人士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其繁荣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民营经济提质增效,有利于汇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有利于取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成功。

(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最具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蔡云清,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研究;李碧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福建省委统战部人文社科项目“营造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创造发展环境研究”(项目编号:TB19015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繁荣。

1.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因体制机制比较灵活，市场适应能力比较强，在决策执行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19 年“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显示，2019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民营企业占 235 家，占比 47%，民营企业数量在 500 强企业的占比连续上升^[5]，创造了五成以上的税收、近六成的 GDP、约 70% 的出口和 80% 的就业岗位。到 2018 年 10 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7137.2 万户、私营企业 3067.4 万户，为解决就业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部分民营资本不断流向文体教育和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推动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繁荣健康。总之，民营经济不仅在我国社会建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并且在经济总量提质增收、创新发展方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民营企业 500 强支撑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民营企业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我们从近 6 年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分析报告”发现，民营企业 500 强绝大多数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体，通过立足制造业、延伸产业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持续占据着重要地位。2013 年至 2018 年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11.02、13.82、17.3、23.39、28.19、34.61 万亿，6 年增长 2.14 倍；营业收入总额分别达到 13.21、14.69、16.15、19.36、24.48、28.50 万亿，6 年增长 1.16 倍；税后净利润分别实现 4980、5920、6980、8350、11,320、12,900 亿，6 年增长 1.59 倍。上述数据说明在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民营资本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仍实现了资产总额、营收总额、利润总额的持续增长，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主要支撑。

3. 民营经济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民营经济在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8 年对外开放以来，我国有八成以上的新产品、超过七成的技术创新、超六成的国内专利发明产自中小微企业，其中约 95% 源自民营企业。可以看出，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产品与要素供给结构，增强以健康、绿色、智慧为特征的高端产品有效供给，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力量。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倡导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就是创新，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大有可为。

4. 民营企业转型成效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民营企业在国家密集出台的政策支持下，在“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指引下，主动适应新常态，力促制造业企业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加大对民营纺织服装、服饰业、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落后产能和高耗能行业的清退力度；同时我国 500 强的民营企业利用“互联网+制造”“制造+服务”“制造业总部经济”等全新数字化经济模式，加快企业转换升级的步伐。截至 2019 年，民营企业 500 强中三产入围企业数量由 2012 年的 117 家增加到 157 家，92.80% 的企业加速转型步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营服务业比重显著提升。

5. 新兴市场拓展成效进一步凸显

根据 2016 年我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2015 年我国约有 120 家民营企业能够进行“可感知、可计算、可交互”的智能化产品的生产；132 家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用户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160 家能够通过提供远程维护、实时监测等服务来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195 家能够提升智能制造装备，开展智能化生产；225 家形成了基于互联网的协同研发、开放创新模式。此外，数据还显示市场盈利较强的行业包括电子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商务服务

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等，三者分别达到了18.88%、23.10%和25.13%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见，在国内国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各种实际问题突出的环境下，民营企业也能够积极把握机遇，精准定位、布局谋篇“互联网+”所带来一系列新生业态和新兴模式，为民营经济注入转型升级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关乎民营企业发展质量

民营经济人士是当代社会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群体之一，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健康稳定关系到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关系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6]，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

1. 企业家主体培育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

一般而言，供给侧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和制度等五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劳动和技术监管，创造全新供给方式，其本质就是要充分调动企业的首创精神。从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发现，劳动力、资本、土地作为生产力的“硬件”要素，曾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强劲的支撑力，但在我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明显滑坡；创新、制度作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软件”因素，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迸发出强大的发展后劲，并推动中国经济形成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民营企业家作为最具创新精神和才干的特殊人才，他们除了具有独到的眼光，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需求之外，同时敢于接受挑战，勇于承担风险，能够组织资源开发新产品，创新生产过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是创新的最好促进者、最终实现者，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力军。因此，只有抓好企业家主体培育、企业家精神塑造这个着力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抓住牛鼻子，才能带动民营企业家们积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主动“降成本”，全力“补短板”，谋“创新”求“突破”，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有利于促进健康政商关系的形成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人士主流健康积极，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7]。比如，个别民营经济人士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机会，钻制度漏洞、打法律擦边球，或凭借其与政府及其官员建立的特殊关系，以利益输送的方式购买公共权力，争夺政策红利；或违规进入人大、政协，维护既得利益，寻求政治庇护；或干预基层民主，以谋求不当利益。此类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既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8]，损害了公共利益，又毒化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恶化了政商关系，对我国的政治生态、政治秩序、政治参与形成了不良的影响^[9]。此外，还有少数企业家专业知识欠缺、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部分民营经济人士思想观念多元化、经营理念仍较保守^[10]。民营经济人士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亟须通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构建“亲”“清”的更加融洽而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

3. 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关乎社会稳定、百姓福利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生代力量，年轻一代的民营经济人士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股份制公司中的自然人股东、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新一代人士。从思想状况来看，年轻一代的企业家爱党爱国，认同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新时期我国伟大的创造性战略举措；但认知不深，且极易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影响；对宗教普遍持宽容态度，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有偏差；有较强的权力意识、平等意识、问题意识，但又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因此，要进一步关注年轻一代人士思想动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其健康成长。

（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民间投资分化棋局

民间投资是我国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进入2019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也出现略微下滑。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全年

民间投资 4.7% 的增速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略有下降。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数量在中国前 500 强企业占比连续上升趋势中断，民间投资区域分化明显，投资增速前十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南、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后十位则主要在西北、东北地区，近三成的西部投资近年来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此外，民间投资在行业上也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首先，传统制造业民营经济投资乏力；其次，民间资本大量涌入互联网、信息传媒等新经济领域。民间投资步入十字路口，如果任由其“自由”生长，民营经济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衰退。在经济新常态下，民间投资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全面复苏的关键，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够引导民间资本逐渐退出产能过剩领域，加大技术改造和创新，以及第三产业和新经济等领域更加活跃；才能够使民间投资由无效逐步转化为有效，从盲目走向理性、实现提质增效的效果，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的瓶颈分析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也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但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剧烈变化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等因素的影响下，民营经济面临着经济增速趋缓、投资意愿走低、企业家信心不足、创业创新动力不强等困境，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

(一) 民间投资瓶颈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11]。我国从 2006 年到 2015 年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比重上升了约 15 个百分点，但进入 2016 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出现了近 10 年罕见的连续下滑。整体而言，2016—2019 年民间投资增速分别增长了 3.2%、6%、8.7% 和 4.7%，虽然 2018 年占比有所回暖，但总体民间投资的带动能力仍然有限。2019 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保护主义严重、全球经济规则体系变化等影响，民营企业对长期投资、较大的技术改造和创新型技术投入还持观望态度。此外，原材料价格

上涨、金融信贷的收紧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压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民营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

(二) 企业家思维瓶颈

民间资本作为经济活力的不竭源头和经济平稳运行的保障支撑，一直以来在促转型、求创新、稳增长、增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如何在“存量”上提升和“增量”上创新？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如何通过“需求侧”调研，调整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转换企业经营模式满足高端市场需求？由于民营企业发展阶段和自身眼界的局限，企业家对企业转向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型升级的时代性和紧迫性认知不足，理解还不完全到位^[12]。此外，在进行投资方向选择时也心存顾虑，存在融资困难“不能投”、盈利过低“不想投”、投资不明朗“不敢投”的心理，普遍存在面对转型升级“不能转、不想转、不敢转”的状况。民间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其投资增速和企业家信心出现大幅的下滑，必将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亟须高度警惕。因此，提振民营企业家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长期信心，已经刻不容缓。

(三) 生产要素成本高企瓶颈

在中国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包括劳动力、技术等在内的各生产要素价格和融资成本、流通成本的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缺乏设备、土地、厂房等抵押物，信用评级低，贷款利率上浮水平较高，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还是以民间借贷融资为主，要付出过高的成本。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压反腐、铁腕治吏，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出现了以反腐为借口，对民营企业家“退避三舍”，在提供正常服务和发展环境上缩手缩脚，而一些企业家遇到困难也不敢去找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四) PPP 模式亟待进一步推进完善

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是当前地方政府

吸引社会投资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力推的一种投融资管理模式，旨在打造一个政府和私人投资共赢的发展新格局。但在具体实施与推广过程中，PPP项目推介规模扩张较快，签约和开工率偏低等问题突出。据赛迪智库的研究显示，目前国内PPP模式的签约和开工率都较低，根据财政部PPP中心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数据显示，2014至2019上半年，全国累计9036个项目纳入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投资总额约13.6万亿元，但累计实际开工项目3466个，仅占总数的38%。这说明作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重要机制，PPP亟须进一步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打破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PPP市场，大幅拓展社会资本的发展空间，释放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构建“亲企清政”的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二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的凝练解读与高度概括，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商关系必须遵循的规则与伦理^[13]，涵盖了政商之间“亲密”而不失“分寸”的和合思想和内在联系。

1.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加快清理完善涉及民间投资的法规政策，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价格收费管理等领域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动完善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快构建有利于民营经济健康营运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

2.实施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动态管理制度

一是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加大简政放权力度，通过规范、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界定部门单位的行政权力，建立权力清单，实现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规范权力运行。以权力清单为基础划清领导责任与监察责任、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同时列出责任清单，实

现政府“法定责任必须为”^[14]。三是加强对行政权责清单的编撰、审查和统一管理，建立权责清单管理的同步更新与长期监管机制。四是完善权责制约监督机制。加紧权力事项、责任事项、追责情形“三位一体”权责制度的构建，促进权力公开、透明、高效运行。

3.打通政策落地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一是要通过抓典型、严问责，全力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二是积极建设和管理政府网站，注重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构建起一个能够全面、主动、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的政府网站，使政府网站成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三是加大免费培训和送政策上门的服务力度，使民营企业家能够紧扣政策优惠信息，提高其解读和政策运用能力。

4.创新商协会服务模式

商协会作为社会化、市场化的组织平台，具有沟通政商的平台优势。一是通过商协会组织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学习我国政情经情，帮助民营经济人士正确认识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补短板”政策所蕴含的商机，积极投身创新创业，从质量和效益两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补齐短板，推动企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二是积极开展创建“坚定信心、守法诚信”示范商会活动，提升民营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做维护良好社会风气、构建“清”“亲”政商关系的表率者和实践者。三是激励企业家担起办好企业、创造财富、回报社会的责任，鼓励企业家带头献爱心，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二)拓宽民营经济投资的领域和空间

1.加强对民营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引导

一是引导民营企业紧盯国际市场新变化，促使其加快产品优化、技术创新和市场导向，显著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积极“去”。二是引导民营经济积极对接高端产业项目，拓展价值链，加快民营经济技术革新、品牌扩展、产品衍生、管控升级等，主动“降”。三是引导民营企业全力“补”，做好核心科

技、顶层技术的“乘法”与“加法”，加强供给体系的提质增效，做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

2. 推广 PPP 模式

一是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发挥工商联的纽带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做大做强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社会公益、资金支持、经贸互通等领域，大大拓展民营资本的投资范围边界和涉及领域。二是积极引领民间投资通过多种形式、诸多渠道参与国企改革重组，资金支持雄厚、文化底蕴深厚、技术条件优越、管理方式先进的民营企业可以借此方式做大做强，实现互利共赢。三是通过拍卖、租赁、重组、兼并等多种形式进行合理置换，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为民间投资的发展腾出空间。

3. 加大统一战线助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力度

一是要加快完善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体系。加快资源整合，建立以国家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且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我国的国际化投资咨询服务结构，提高政府和社会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利用统战系统的建言渠道，促进政府加快研究提出税收、外汇、金融、保险、人才培养及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提高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和能力。三是发挥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制定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细则，推动民营企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优势产能转移，促进民营企业结构升级。

（三）引导民营企业再创发展新优势

1. 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

一是要合理使用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诸多经济杠杆，规划引领民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景^[15]和方向。二是要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促进减税、降费、融资等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政策性、制度

性交易成本。三是要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降低民营企业用工、用能、用地以及物流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2. 着力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

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加大在研究开发、检测分析设备、中间试验等硬件设施建设，借助现代化的大数据平台和“互联网+”相结合，进一步拓展民营资本的经营范围和触达能力。鼓励民营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大型企业以及政府的公共技术平台合作，共享硬件资源，出台合理高效地匹配人才和分配资金的政策举措，缓解潜在的民营企业家的流动性约束以促进民间创业活动。

3. 重铸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民营企业“产业报国”的必然选择。一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强化商品质量，融合私人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打造市场热销的品牌，推动民营企业促转型谋创新。二是要引导各类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专攻一种产品、一门技艺，做专做精零部件产品，形成富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群体。三是要积极探索“技工院校+职业训练院”的改革发展模式，培养和造就大量面向高层次需求的实战型工程技术人才。

4. 着力提高民营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深入跟进民营经济人士的品格信仰教育活动，加强年青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引导和培育力度，着力培养一支具有改革开放新时代血液的企业家团队。二是推动“新生代企业家”素质工程建设。通过强化实践锻炼，鼓励新生代企业家接班人到企业一线基层锻炼，到其他优秀民营企业挂职锻炼，到知名外企体验锻炼，提升新生代企业家在多种复杂环境下的实践经验和应对能力。三是充分利用政策广纳贤才，构建起民营经济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的完善机制，探索建立人才与资本对接平台，打造有利于开展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社会环境。

（四）提振企业家创业干事的“精气神”

1.创新统战工作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一是配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系列行动计划的战略实施；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引导企业加快产品、技术和销售模式等革新，不断提高技术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能力。二是积极推进统战工作进园区。深入解读、及时反馈和高效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诸多制约瓶颈，帮助民营企业坚定理想信念、走出发展桎梏、步入良性循环。三是充分发挥工商联教育培训、信息宣传、融资担保、法律维权、校企合作、政企沟通等方面作用，鼓励民营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加速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

2.依法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一是要加强对新常态下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分析研判，突出打击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二是要继续修改和完善有助于促进民营经济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大数据时代侵犯知识产权新型犯罪研究，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民营经济自主创新成果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3.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社会责任感

一是加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思想觉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新时代民营企业接班人做勇于开拓、尊法懂法、爱党守信、乐于奉献的表率者^[16]。二是督促民营企业依法生产经营，照章纳税，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职工工资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17]，促进企业运营、劳动关系、内部秩序协调稳定发展。三是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通过联村、包组、包户等模式，在富民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参与精准扶贫。同时，鼓励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积极参与农村建设，在改善贫困村农业基础设施、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发展上下功夫，为帮扶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助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3-05.
- [2]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1-13.
- [3]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EB/OL].(2016-03-04).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04/c1024-28173123.html.
- [4]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 [EB/OL].(2018-11-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1/01/c1024-28173123.html.
- [5] 吴小燕.十张图看懂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 民营企业影响力扩大[EB/OL].(2019-09-10).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90910-1e150e4c.html.
- [6] 朱浩铭.新常态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2017.
- [7] 徐志南,卢彩翔,俞凤琼.福建省工商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商会实践[N].中华工商时报,2016-06-13.
- [8] 王峻峰,杜京彧.多措并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N].河北日报,2016-06-22.
- [9] 杜京彧,彭龙杰.辛集市多措并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N].河北经济日报,2016-07-11.
- [10] 关于大力改善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N].河北经济日报,2016-02-05.
- [11] 叶晓楠,张云歌.中国民企呈现良好发展势头[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8-26.
- [12] 靳生.安徽省工商联：提振民企信心 激发创新动能[N].中华工商时报,2016-02-22.
- [13] 徐志南,卢彩翔,俞凤琼.福建省工商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商会实践[N].中华工商时报,2016-06-13.
- [14] 探索推广“负面清单”管理 创造企业“宁静经营”环境 [N].河北日报,2016-02-05.
- [15] 春花.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对策探讨[J].今日中国论坛,2013(10):73、75.
- [16] 张燕红.统战工作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建泉州为例[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1):81-88.
- [17] 杨卫敏.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创新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5):4-17.

责任编辑：龚万达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谢 军

摘要:如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有不同的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理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说价值观的历史积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落地生根,还需要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现实土壤,不同的价值观是不同时代的反映,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量变才能推动价值观的质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找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消除一切消极因素。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辩证法;机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72-04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如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有不同的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理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启示。

一、矛盾对立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之动力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其自身以及形成的条件也离不开矛盾。一方面,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它反映了特定阶层和人群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大人民意志和精神的体现,是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产物。富强和民主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很多次农民起义的口号,古代的农民阶级往往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步伐从来没有停下过,劳动人民一直和统治阶级抗争,争取获得民主和平等权,就像陈

收稿日期:2020-05-17

作者简介:谢军,南京市委党校雨花台分校高级讲师。

胜吴广起义提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近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人来说等于是痴人说梦。从清朝的皇权政治到北伐前的军阀统治再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直被压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有了制度和物质的保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贫富分化加剧，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并存，道德的失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各种群体事件和极端案件时有发生，这其中固然有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但思想层面的问题是根源，为进一步统一思想道德规范，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行为范导，十八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纵观古今中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绝不是偶然，它是建立在自始至终矛盾双方斗争的基础上，正是由于人民的不懈斗争，才有了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基础。

二、质量互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之基础

如果说价值观的历史积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开花结果，落地生根，还需要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现实土壤，不同的价值观是不同时代的反映，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量变才能推动价值观的质变。

就国家层面的价值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劳动人民的美好期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是受特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中世纪的欧洲，农业是主要产业，同时还有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当时的社会管理模式是采邑制或者领主制，从公爵、侯爵、伯爵、子

爵、男爵层层分封，每一个层级的领主拥有本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下一层级固定地向上一层级缴纳贡赋，提供兵力，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管理模式，特别有利于统一思想的形成和稳固，基督教正是利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加强基督教文化的统治，基督教神学统治着当时社会的一切领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人们处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中，没有民主和自由可言。而在东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受尽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整个社会阶层主要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为专制提供了便利，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专制性反映在农民阶级的价值观上就是愚昧、奴性和故步自封等特征。这种情况思想状况延续了几千年，几乎没有质变。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生产力也得到迅速提高，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的巨变，也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旧的封建残余思想逐渐得到清除，经济政治的质变引起了社会价值观的质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应该说，市场经济带来的创新、竞争、公平、参与、互赢、效率等思想也在影响着人们，这些思想中渗透着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如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平等的主体，他们理应受到平等生产、平等交易的待遇；他们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参与贸易和生产，自主地决定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他们在法律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除了要求人们恪守诚信精神，还要求人们遵守市场经济的

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的秩序。这是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的积极变化。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曾经一度影响到思想和价值观领域,“一切向钱看”“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一度盛行,“苏丹红”“瘦肉精”“黑心馒头”等事件频发,再次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社会的人,都有其特殊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相对简单,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而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专业经纪人、社会组织带头人、中产阶层等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而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隔阂,各自的价值观呈现出摩擦和冲突的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增加,特别是这些年境外旅游持续升温,表面上是旅游,其实是一种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国游客在境外感受到国外多元的价值观,对他们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触动,久而久之,对自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认识必然产生影响,此外,国外电影、艺术等文化作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我国目前价值观多元的原因。应该说,价值观多元并存实际上是造就了价值观发展的量变基础,由量变到质变,需要人们思想上的自我反省和道德上的自我反思,同时,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党和政府推动价值观的整合和发展,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当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三、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之形成

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先决条件和形成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找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

数,需要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消除一切消极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扬弃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这些价值观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好的和坏的都要扬弃,坏的东西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推动作用,好坏是水火不容的。因此,扬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根本途径。

从国家层面来看,富强是价值观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开展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走向了富裕。但是改革开放也催生了富人阶层,贫富分化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必然牵涉到价值观问题,尤其是对待富裕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宪法增加了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追求富裕是每个人的权力,但是富人的财产权也要保护,这是对人们富裕权的全面理解。

民主的本质是人们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民主这种价值观的产生一直伴随着与专制的斗争,如何对待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观,简单地否定和简单地肯定都是不对的,民主和专制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只是发生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民主虽然有利于人民体现主人翁的地位,但是过度的民主也会让社会失序,政治无度。专制在今天看来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是专制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作用,正是中央集权制确保了我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保持统一的,专制是不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但是专制中的集中统一的思想在特定条件下是积极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主,应该是包含集中的民主,只有民主和集中形成张力,相互制约,才能确保民主健康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由是首要价值,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自由得不到保证,伴随着人们的不自由、封闭和保守。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由有限,自由属于少数地主阶级和资

产阶级，人们不能自由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经济上的贫穷导致人们经济自由度很小。核心价值观提倡的自由，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权，但这种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的，是以遵守法律和道德为前提的，正是因为人们感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才保证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是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在扬弃过程中，既要保证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自主决定权，也要考虑到国家、社会、他人利益，考虑到一定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则，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一致。公正和平等同样如此，二者都是相对的，遵守法律和道德法则的公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

从个人层面看，爱国是首要价值目标，过去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自己的祖国，现在我们讲爱国，既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人民，还要爱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没有这样大爱的思想，爱国主义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外交目标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就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最好阐释。这种爱国，是要扬过去的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扬过去所弃的爱世界，所以扬弃并不是对立不包容的，而要辩证地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无论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还是质量互变，目前而言是一种现实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追求的最终的价值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么描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责任编辑：鲍跃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景观中的体现

张羽清 范佳鸣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随着城乡一体化加快,加强在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乡村景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在乡村景观建设中,要将乡村地域文化融入景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景观中的“本土化”展现,增加村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景观;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76-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新时代,乡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多变的价值观念对乡村民众思想的冲击更加强烈,影响更加复杂,运用各种方式手段加强在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乡村景观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生产生活场景的表现,既是人们价值观、审美表达方式和能力的体现,也从不同方面展示和体现着价值观。在乡村景观提档升级的重要时期,充分认识乡村景观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提升乡村景观建设的整体性,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地域特色和表达方式,增加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精神动力。

一、乡村景观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景观不仅是植物造林和城市绿化,而且是建立在一定美学基础上,融合了农学、建筑学和艺术学等多重学科的综合领域^[2]。乡村景观的存在和发展,能够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乡村景观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具象化,也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

收稿日期:2020-07-08

作者简介:张羽清,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乡村景观、城乡规划设计;
范佳鸣,江苏澳洋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设计总监、高级工程师。

经济发展，并带来了农业、农民、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变化。经济发展使乡村景观得到改观，乡村景观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又加大了投入，增强了规划性，以乡村景观为基础的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服务业的重要收入支柱和发展方向^[3]。乡村景观作为现代乡村旅游的重要基础，是带动乡村产业链发展，体现乡村地域文化，提升乡村吸引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4]。农家乐、民宿、休闲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带动了第一产业(农产品)销量的提升，农村的第二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也获得了增长。如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石坡乡的南坪头坞村，被称为“七彩村庄”。当地村委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画家采用文化上墙的方式，将全体农户墙体全部进行彩绘，打造出色彩斑斓的“七彩村庄”。如此独具特色的乡村景观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当地有农家客栈20余家，黄花茶、高粱酒、油葵等特色产品供不应求，形成了当地“景观—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进一步建设和维护乡村景观，改善农村环境，为构建美丽乡村提供持续动力。可以说，乡村景观影响着乡村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村富民强”的良好势头。

(二) 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缩影，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5]，“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6]从一定意义上说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价值观的自信，人们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有“魂”和“根”。

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乡村承载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其中的乡村景观是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综合体现。一方面，乡村景观可以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7]。乡村景观能综合反映乡村的地形地貌、居住空间、建筑形式、农作物种类、民风民俗等特质，这些文化是由先民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沉淀而来，村民在世代传承中形

成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无论乡村环境如何，村里的山头、老树、河流、稻田都是村民们无可替代的回忆。在淳朴的乡村生活环境，村民们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好的乡村风气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乡村景观具有地域特征，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旅游的原生性及其本质都要求其发展必须与文化紧密结合^[8]。乡村景观作为反映乡村文化的载体，可以将不同地域的乡村风俗展现在居民和游客面前，既可以对外扩大乡村文化的知名度，又可以增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因地制宜地挖掘和打造乡村文化，有利于塑造新时代乡村精神、乡村价值和乡村风尚，最终带来“百花齐放”的乡村文化景观。

(三) 乡村景观是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反映，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美丽宜居的乡村离不开优美的环境，生态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民生发展的新需求。以前村民“盼温饱”，现在“盼环保”；以前“求生存”，现在“求生态”^[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繁荣稳定发展的基础，社会文明、布局合理、文化丰富、生态良好的乡村才是美丽乡村。

乡村景观的生态可以理解成乡村社会的生态，乡村景观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财富。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注重的就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今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融汇了东方文明而形成的，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在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农家乐小院考察调研时表示，“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就是美丽经济”，很多游客到了这里都表示“看得见远山，找得到乡愁”^[10]，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我国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无论城市景观还是乡村景观建设都体现着时代主流的价值观。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与践行,我国乡村景观建设无论在内涵意蕴上,还是在形式表达上都有许多创意,体现和宣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过度商业化导致乡村景观同质化严重

乡村景观之所以独具魅力,能够吸引众多旅游者,主要因为其独特的地方文化。过度商业化使乡村居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生产习惯和心态,越来越多的村民丢弃传统,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如此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使乡村景观脱离真实与质朴,对乡村居民的正确价值观形成冲击,对当地居民的文明、和谐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商品同质化严重,质量粗糙,形成审美和消费疲劳,降低了旅游中的美好体验;三是大量农家乐、民宿、休闲农业园等无序涌现,价格高、质量差、服务水平低,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规划与设计,不利于乡村经济和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长久发展,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文明、和谐。

(二)忽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乡村文化是乡村留存的根,乡村社会的知识、智慧、哲理等价值是乡村景观的本质。乡村景观的维持方式是建立在长久以来乡村生活的经验上的,在乡村生活环境通过人际传承代代相传,有些带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和故事的景观遗址,需要在现代农村生活中创造性改造加以传承。通过土地利用、乡村建筑、景观布局、族谱修编、节庆祭祀、居住饮食、特色的动植物、婚丧嫁娶风俗等活动保留下来,在代际传承中巩固与重构,从而内化成现代当地人的规范、记忆与信仰,并不断发展和展示。

然而,在现在的一些乡村景观中,有的过度西化,特别是有些乡村的欧式建筑与本地整体风貌不相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因素;有的一村

建成数村模仿,形成了“千村一面”的现象;有的不注重乡村文脉、习俗、本土人口的可持续保护和发展,乡村景观建设没有和谐一致的风格,杂乱无章;还有的修旧如新或推倒重来,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三)宣传简单化导致乡村景观塑造过于刻意

有些乡村只是简单地设置标牌标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将乡村文化和价值观结合起来;有些乡村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点和方式比较突兀,与景观没有产生互补增色的效果;有些乡村设计雷同,无法与其他乡村相区别。简单粗糙、缺乏美感的核心价值观标语,必然无法使人在其中得到滋养和提升。

三、打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相融的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同发展中,合理利用好乡村的风土、风物、风情、风景,夯实农业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升文化内涵,实现对乡村内部的产业结构、文化风貌、社会生活、生态景观等变革,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格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中。

(一)统筹兼顾,综合打造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

首先,在农业生产景观布局上,为提高农田作物的多样性,可以结合农作物的肥力、水利、土壤质地、光照等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和环境特性,因地制宜地分配轮作、间作、混种等多种播种模式,不仅可以提高亩产能力,还可以增加农业景观的多样性。其次,在建设农村的生活景观中提升乡风文明,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中。如通过整理家谱、历史、名人故事等,将村中家族祠堂建成文化祠堂,家族的历史和家训写在祠堂的墙上,把部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通过墙绘、标牌等形式展现出来。将宗祠文化、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素养。如:山西省长治市上

党区振兴村充分运用汉字、典故、诗词、家训等内容,以书法、绿化造型等艺术手段,打造彰显鲜明价值引领、凸显地域风貌和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示范长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效融入乡村景观建造和百姓生活之中。最后是注重乡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从农业生产性土地提升到乡村景观,不仅要搞好生态系统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通过合理的物种循环和能量转换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还应重视农业景观层次上的山、水、田、林、湖、草、路形成的景观格局以及水土与生物等生态过程的恢复及重建,提高农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升生态景观价值。例如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依照山林地形打造茶园,在其中设置凉亭、牌楼等供村民种茶休憩区域,整体农作物依山而行,充分利用土壤条件并与当地生态环境融为一体,体现了乡村农业蓬勃发展,农村生活欣欣向荣,乡村环境美轮美奂的场景。

(二)突出文化性、地域性、乡土化,将地域文化融入乡村景观

从营造景观实体和创建景观氛围两方面入手,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旅游、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充分挖掘乡村地域文化,将其体现在乡村的建筑、道路、公共艺术、标识设计等景观实体中,乡村中的农耕工具、门墙院落、稻田植物都可以成为乡村景观打造的对象。例如河南省信阳市郝塘村将原本破旧的水车作为乡村民宿的摆件,周边种上一些藤蔓植物,成为当地民宿的“地标”,让从事多年农耕的村民有“根”可寻,有“源”可溯,记住了乡愁,热爱家乡,愿意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另一方面,依托乡村的地理特征、历史渊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的民风民俗、节庆活动,发扬民俗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去除和改造糟粕,让乡村民俗与时俱进,推进移风易俗。例如安徽省引导各地建立完善的“一约四会”制度并发挥有效作用。截至2019年底,全省农村“一约四会”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同省巢湖市“三瓜公社”保留了乡村优秀的风俗,安徽省巢湖市半

汤镇传统的油坊、布坊、茶坊、酒坊、蔑坊、陶坊、烤茶等40余个手工艺作坊和场景再现,并恢复部分民间手工艺,还原传统农村生活景象。诸如“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农村未来中国人的奢侈品”“乡村美,人更美”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结合当地熟悉的手工场景,出现在墙绘、雕塑上,让当地村民获得了归属感、认同感、富足感和幸福感。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融入乡村景观细无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1]农民是农村的主人,要改善乡村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陌生感,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能力,增强核心价值观对当地村民的吸引能力,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进行宣传,还要针对不同乡村的自然景观、文化民俗等地域特色,来打造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标语。不同乡村的文化教育程度不同,依托乡村本身的“乡土化”元素,运用乡村景观为载体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有亲和力。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充分挖掘地域文化,打造了民俗特色的景观,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水车、墨斗、手工造纸、手工年画等一系列农耕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句印刻在独具特色的党建文化墙,一些村庄的家风家训、伦理道德、乡规民俗也印刻在以墙体为背景的公共艺术中,周边摆放着一些废弃农耕用具作为景观点缀,路边则是小溪潺潺,与整体景观环境融为一体,充满了当地乡土风情而又不显得突兀。还可以运用雕塑诉说革命历史,让人们在寻访红色遗迹、继承红色文化传统、欣赏田园风光的同时增强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要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离不开广大乡村经济的良好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离不开乡村社会的

治理有效,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离不开乡村农民的良好素质。要把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融入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用主流价值观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文明新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2]

乡村强则国强,乡村富则国富,各地要重视乡村景观的作用,保障乡村景观的实施,结合乡村地域文化,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本土化的乡村景观相互结合,实现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11][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5.
- [2] 周武忠.景观学:“3A”的哲学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87–94.
- [3] 马克伟.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J].社会主义论坛,2019(5):45.
- [4]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EB/OL]. (2018-03-02).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
- [5] 中国外文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
-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 [7] 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 [8] 颜廷利.文旅融合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智库时代,2019(48):39–40.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120.
- [10] 李中文,方敏.绿水青山带来了金山银山[N].人民日报,2020-01-27(01).

责任编辑:宋好